

# 立场 - 教育对话

POSITIONS: Dialogues on Education

i	刊首语	
1	乡村课程改革 ——乡村教育促进会的教学试验	林治美
15	西部支教日记（三）	周忆粟
35	世界、学理与自我 ——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	项 飏
50	主题征稿启事	

版权说明：本杂志采用 CC 版权（Creative Commons）知识共享协议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3.0 Unported”



## 刊首语

上期杂志中，我们在一贯的征稿之外，特别针对城乡儿童学习成绩、课程减负、网络技术、和 NGO 在中国的教育尝试四个专题增加了特别征稿，期待朋友们来函来稿参与讨论。

本期介绍了一个年轻的 NGO 组织——乡村教育促进会（RCEF）——在山西关爱小学的课程改革试验。年轻的志愿者们志在更新教与学的方法，然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却不得不参与学校制度的设计和校内组织的建设，不知不觉地“成了半个校长”。这个摸索的过程提示出课程改革中所隐含的制度改革的前提。课程和教学是教育最核心的活动，这核心活动的主体是人——教师和学生，而人是受制度环境的约束的。因此，教学方式和内容的变化，不但要求学生和老师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必然要求学校文化、管理方式、师资培训和评价体系等制度随之而动，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革。而 NGO 的定点试验往往能够为更大规模的政策调整提供经验和线索。关爱小学的试验展现了乡村学校实施新课程改革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乡村教育促进会仍然在继续摸索解决问题的路径，并邀请教育者和决策者一同思考：我们的力气到底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周忆粟的西部支教日记展现了另一所农村学校的景象：教师的尴尬、学生的暴力、管理的懈怠、家长的无奈。这一切为农村教育改革加上了更多旁注。

最后，项飏的文章将我们的视线引向学术研究。他的叙述生动真实地记录了一个中国的年轻学者求学海外，迷途于西方的理论，最终在澳大利亚和印度的田野调查中找到理论与现实的交点、找到了自我的故事。项飏呼吁人类学研究回到政治经济学，着力分析和解释被研究者真正关注的现实问题。他也是少有的留学海外却并不研究发达国家也不回头研究中国问题的社科学者。“睁眼看世界”是百年来历代知识分子不敢松懈的责任，然而，这个“世界”并不仅仅是发达国家黄金遍地的花花世界。中国要有文化自信，必要知己知彼，在完整的世界图景中准确地定位自己的位置。这将有赖于中国学界的共同努力。我们年轻人，任重而道远！

《立场》编辑小组

## 乡村课程改革 ——乡村教育促进会的教学试验

林治美

### 一、教育应为改善生活和社区做准备

乡村教育促进会（RCEF）从 2004 年开始活动，2005 年正式注册。从 2004 年开始，我们一直在讨论：“我们组织的宗旨应该是什么？”有的人认为应该是减少城市和农村学生高中升学率的差距，有的人说是提高城市和外国人对农村教育的了解，有的人觉得应该给农村学校提供资金和硬件支持……最后，我们确定了这样的宗旨：推动教育为乡村学生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社区做准备（To promote education that prepares rural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lives and their communities）。

我们知道以提高升学率为目标，始终会有大部分学生被放弃。而且，升了学，找到好工作的学生当中，很少会致力于运用自己新获取的资源去帮助家乡的发展。这样，他们家乡以后的学生还是在同样缺少资源的环境下受教育，没有中断恶性循环。同样，以捐钱或改善硬件条件为目标也解决不了农村教育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看到过很多很多接受了资助的学校把捐赠的书本和电脑都锁起来。盖了新教学楼的学校，只是在更漂亮的环境中提供同样的教学，对孩子的学习来说没有多大的区别。另外，我们看到沿海已经能说是达到小康生活的农村里，上学已经没有经济障碍，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学生自己选择辍学。他们辍学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所学的知识对他们现实生活没有很大的用处；或者因为多年来被视为没有希望的学生、被老师忽视或歧视，没有信心继续下去；或者是因为没有意义的课程、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形成了严重的辍学。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被老师打或被其他学生欺负。经过两三年在农村跟老师、家长和学生谈话，开展暑期支教活动，不断地讨论，最后我们认为改变教育的内涵（课程和教育方式）是最重要的，并提出了上述宗旨。

### 二、本土化：从洋学生到土老师

起初，我们的工作方式是组织海内外学生志愿者利用暑假到乡村进行短期支教，许多海外留学生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在确定了组织的宗旨之后，不久我们就意识到这个目标不可能

通过短期支教或者“远程”项目达到。更有用、更有效、更适合农村情况的课程和教育方式，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发展出来。所以，我们决定开始定点试验。

这时候，我们已经进行了三期短期支教，也通过一些其他小型项目跟一些农村学校合作过。我们在这些学校当中选择了我们认为最合适的长期合作伙伴。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学校的负责人是否认同我们的理念与目标、学校的老师是否有教学热情并愿意尝试新方法、学校是不是有空间进行改革。最后选择了三所学校：一所是民办小学（关爱学校）、一所是志愿者运营的初中（复新志愿者学校）、一所是社区学校（殷家林社区学校）。最后，因为后两所学校自身不稳定，所以决定集中在山西的关爱学校长期进行实践。

关爱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所以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和老师们灵活地试验。学校的发起人和校长理解和认同我们的教育理念。课程改革之后，很多校长老师都懂得如何罗列“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这不代表他们愿意在学校实施这样的教育。我们比较相信孙校长是因为关爱学校自己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但是因为她们缺乏对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方法的了解和方法，所以很渴望得到我们在专业和精神上的支持。另外，当孙校长回想自己作为学生、代课老师和家长的经历时，经常会很痛苦又很坚决地肯定她创办自己学校的初衷：希望以后的学生不用像她一样。她这种切肤之痛让她能够更有决心地进行教育改革。我们暑假到关爱学校支教时跟学校的老师合作，发现学校的老师也是比较有活力，思想比较开放的。

刚开始，我们的项目叫 Teaching Fellows Program（教学研究员计划）。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重点是放在外来的教学研究员身上，希望他们通过自己在农村教育以及跟农村学校的老师合作积累好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当时有大概六十人报名，但是绝大多数是应届毕业生。他们没有教学经验，也没有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经验，而且不一定愿意长期留在这里工作。这样，我们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培养他们，等待他们进入状态，而他们进入状态以后可能很快又要走了。其实他们跟当地本身的老师比较，没有很明显的优势。所以我们又决定改变策略，以本地的老师为主体进行试验。毕竟他们更有教学经验、更了解当地社区和学生、更有可能留下来成为当地农村教育的重要力量。于是，我们只招聘了几个有教学经验的、跟我们教育理念相似的“教学教练”（Teaching Coach）来支持当地教师本身的专业发展。

我们在关爱学校的教学教练几乎都有教学经验，没有教学经验的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另外，大部分都有在农村工作或当资深志愿者的经验。在第一年，我们有很多有外国背景的工作人员。我们在慢慢地过度成为一个以内地人为主的团队，因为内地人跟合作伙伴的文化差异更少、更熟悉内地的工作方式和制度，而且更稳定。今年，我们的六位做教学工作的人员当中，有四位是内地人，其中一位是永济本地人。

我们的目标是想**积累一些可以跟其他学校分享的课程发展和教学方式方面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样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才是好的呢？它必须达到我们宗旨所提出的两个目标：一、为改善自己生活做准备。在小学阶段，我们的重点是培养那些无论做什么工作、在哪里生活都会需要的基本能力，比如：沟通、获取和分析信息、解决问题、自我保护等等。二、为改善自己社区做准备。这包括了解自己家乡、认同自己家乡丰富的自然、文化和历史资源、锻炼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培养采取行动所需要的自信心和自主性。跟积累经验同等重要的是**培养一些老师成为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我们希望老师们更有自主性和创造性，能够有效地创造和运用这样的课程和教学方式，也希望他们习惯反思、习惯跟别人表达自己的经验。

### 三、教学改革的前提是校内制度改革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花了一年时间慢慢地跟学校磨合。那时候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在学校。他们启动了一些课外活动，像课外阅读和编辑校报。他们主要是通过跟老师共同生活、共同工作来相互认识，和跟校长商讨以后的合作方式。

到了第二年，我们想开始发展课程和教学模式，也有六个人的团队。但是我们发现学校的一些制度和环境阻碍了我们的工作。譬如说，学校对老师的评价主要是看考勤、考试成绩和学生获奖情况。评价老师教学的一部分只是根据每月一次公开课的评比结果来衡量，这一次精彩的表演不能反映老师平时的教学。这样的评价制度没有激励老师研究和创造新的课程和方法。于是，我们和学校的校长共同探讨更能激励老师的评价制度。

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包括：我们想通过评价引导老师往哪些方面努力？这些各个方面的重要性如何排序？怎样避免老师因为评价产生竞争，而鼓励他们互相合作？如何才能让评价成为支持老师专业发展的工具，而不只是奖励和惩罚？怎样才能确保评价是公平的？怎么样的评价系统能够奖励每一点的进步？因为我们和校长在这方面都没有经验，所以花了一整学年的时间才成型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制度，而现在还会继续调整。表（一）是我们设计的评价标准。除了学校对老师进行评价以外，老师还会给自己设定目标，也会互相评价。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还在很多其他方面跟校长和老师们一起建立各种制度和做事情的方法，其中包括建立教研制度、调整学校的时间表、减少老师的工作范围等等。

我们认为学校的教研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不是什么专家，而且作为外来者对农村的学校和学生了解不够深入，所以我们没有能力独立地给老师们提供充分的专业发展，很

大的程度上还是要靠老师们一起探索、交流学习。我们最初召集所有老师坐在一起，轮流说自己目前的困惑和成功的经验。虽然这样也有一些有用的经验被提出来了，但是讨论非常分散，没有明确的目的。第二年，我们分科目进行每两周一次的教研会。头几次都是讨论一些非常基础的事情，比如：如何制定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如何备课、如何看出学生的学习进度。这些讨论非常重要，因为很多老师习惯了跟着教材走，根据自己学生的状况结合教材的要求来自己制定教学目标，对很多老师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但是如果老师要成为改革者的话，思考“我要教什么？”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之后，我们的教研会一般是围绕一些老师们最关心的共性问题来进行的。这次开会最后，我们会制定下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让大家有时间先思考和尝试然后再分享自己的体会。乡村教育促进会也会准备一些相关的资料或建议提供给老师们。有时候，在教研会上会集体备课，一般是选比较难教的或者很能体现我们最近讨论的问题的一课。集体备课之后，会一起听、评课。

教研活动除了开教研会之外，还有经常的互相听评课。学校对老师有规定每月听评课的最低次数。老师一般会选择去听认为自己学习的老师的课，或者为了加强同年级老师之间的沟通合作会听同年级的课。有时候教研组成员会联合起来设计教学活动。比如说，第二学期开始的时候，各个年级都会有跟春天有关的课文，不同年级的语文老师会合作把学生带到田地里观察春天的景色。另外，教研组会重点帮助经验少或者能力较弱的老师。慢慢地，教研组开始承担一些管理功能，比如互相评价、决定该科目的教学规范要求（备课格式、学生测评方式等等）。原来教研会是由乡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人员主持的。现在每个教研组有一名组长，由她负责召开和主持教研活动。

老师对新制度有很多不同的反应。有些改变减轻了老师的工作量和压力，譬如：把更多学生生活的工作交给生活老师承担、取消很多琐碎的规则和要求、把原来的很多惩罚措施改成以激励为主等等。但是也有一些老师认为某些改变增加了他们的工作压力。譬如说，以前学校只会看老师有没有备课，但是不会很重视他们的课设计得好不好；以前只会根据老师每月一节公开课来评价教学能力，现在会看老师平时的教学方法。老师经常对新的制度提出建议，我们和校长也是不断地根据他们反映的困难在调整。比如说，老师每次听课时会写听课记录。刚开始设计的听课表老师反映比较繁琐，写的内容很多。我们主动地收集了老师们对听课表的建议，然后进行了几次修改。说到底，如果要进行教育改革，不能避免增加老师的工作量，也肯定会有一部分老师抗拒参与。所以我们一直在考虑到底要进行全校的全面改革，还是以个别老师为单位试验。当然，每种做法各有利弊，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找到最好的平衡点。



表（一） 关爱学校教师评价表

教师姓名：\_\_\_\_\_年\_\_\_\_\_月

	关爱学校教师评价标准	学校	互评	自评
上课	每节课有明确的、具体的教学目标（每单元要有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目标）			
	一节课中的每个环节都是直接为教学目标服务的			
	有效地达到了一节课的教学目标			
	老师能很好地跟学生沟通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检查效果，并清楚个别学生的掌握程度			
	要照顾到每个学生，对达不到教学目标的学生给特别的帮助			
	给学生参与和实践的机会			
	跟实际生活或学生熟悉的事物联系起来			
	合理使用课外教学资源			
	板书工整、规范画图表			
	上课前要候课			
测评	测评能清楚地、真实地反映学生对教学目标的掌握程度			
	测评有非常具体而且适当的标准			
	长期记录每个学生测评结果			
	测评后分析问题，给没有掌握的学生补习			
	测评后给学生反馈，让每个学生清楚自己的学习情况			
	学校能力测评成绩达标			
	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在学校能力测评和考试中跟其他学生的距离有所拉近			
考试成绩达标				
备课	根据制定的格式备课			

	备课真实、为上课准备			
	经过思考设计，不是盲目跟从课本			
	写好课后反思。从优势、不足、改进三个侧面总结，而且多反馈学生在课堂上的情况			
教 研、 听 评 课	教研会：抱着积极的心态有效发言			
	听评课：看上课老师是否达到以上的“上课”标准，并指出实际的例子			
	听评课：不但观察老师的教学，还仔细观察学生的反应			
	听评课：给上课的老师提供真诚、具体而有建设性的反馈			
期 末 论 文	关注某一个具体的事情			
	反映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包括自己的实际经验或者尝试			
	对别的老师有借鉴或启发作用			
	根据反思做出相应的尝试和改进			



现在是我们在关爱学校工作的第三年。我们觉得长期参与学校管理和学校教育的每个方面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大的负担，学校建立好制度之后应该可以由校长和教研组长独立运作。我们这学年还是把工作集中在我们原来想做的课程发展和教学方法的探索。我们今年重点开发的项目包括：以四年级为示范继续进行所有科目的教学方法的改革、阅读教育、社会课和综合实践课中的社区调查和校报。

#### 四、儿童中心的教学方法

我们建立制度和协助老师教学的活动是同时进行的。除了建立教研制度之外，我们协助老师教学是通过一对一的辅导、提供培训机会和提供教育方面的书籍。我们花时间最多的是一对一的辅导。我们去年每个教学教练会负责一、两个科目，专门辅导那个科目的老师。辅导的形式包括跟老师一起备课、观察老师上课、自己上示范课、课后跟老师一起反思和总结、跟老师一起讨论如何解决他们面对的困难等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花同样的时间在每个老师身上，甚至在学校的要求之下更关注那些很不愿意改变的老师。后来，我们觉得如果要培养一些改革的先行者，应该重点协助那些最积极、主动邀请我们协助的老师。

我们在各个科目的关注点和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数学课，我们注重培养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所以强调老师让学生通过一些动手的活动自己发现数学规律或者自己应用学会了的数学知识解决问题。举一个例子：三年级下学期有关于计算面积的一课。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老师上课第一件事就是把“长方形的面积：长乘以宽”写在黑板上，让学生背，然后做题。三年级的裴老师给了每个小组一小张一平方厘米的纸块，让他们想办法只利用这块纸量度数学课本的面积。一开始，每个组都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把小纸块作为模板，放到一张纸上一块一块地复制，然后再把很多很多的小纸块拼在数学课本上。有些学生觉得这样做实在是太慢了，就想到还是用一个纸块作为模板画在纸上，但是画了跟课本一样宽的一列才剪下来。在以这一条作为模板，剪出更多跟数学课本一样宽的纸条，拼在书上。最后，还有一个小组想到只需要两条就可以了：一条跟书一样宽，一条跟书一样长，就能算出来。这是一个让学生通过动手发现数学规律的例子。

还有一个关于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例子：我和一些学生准备养鸡。首先要做一个鸡笼，在这个过程中运用了很多的数学知识。比如说，我们的笼子有一部分需要每隔7厘米设一支铁棍。鸡笼子总共3米长，棍子之间需要留7厘米的距离，每根铁棍大概6毫米宽，学生需要算出总共要买多长的铁棍。

在科学课，我们注重让学生通过做实验和观察动植物来亲身体会科学知识，也注重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和科学验证能力 (scientific process)。带领学生观察和做实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指导老师如何才能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有所收获。在 youtube 上有关爱的教师设计的一节实验课的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54SxSTg2io&feature=channel>)。

在社会课上，我们强调不能通过说教进行德育，而要通过一些贴近生活的情景讨论待人处事的方法。我们还注重让学生通过做社区调查和社区服务了解社会。我们一般是用新的方法来教原有的内容。有时候会在内容上也做出一些需要的调整，因为有时候书上的内容确实离学生的生活太遥远。譬如：三年级设社会课程中，有一节课让学生学会表达如何从不同的地方做公交车到自己家。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没有坐过公交车，这节课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们跟三年级的社会老师一起分析了这些课的教学目标，最后发现这些目标是很重要的——认识自己家的位置、认识方位、表达到自己家的路线。我们决定不能只因为教材的活动不合适而影响学生学会这些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我们针对同样的目标设计了其他的内容：带着学生到村里画出村庄的地图，在地图上标出各个重要的建筑物，然后练习表达不同地方之间的路线。

如果我们的改革成功了，也是帮助了学校实现国家的新课程标准。我看过每个科目的课程标准，发现很多目标和方法跟我们提倡的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我们跟老师工作时也经常会把课标拿出来作为参考。拿品德与社会的课标为例吧。课标说明品德与社会的基本理念说明：“帮助学生参与社会、学习做人是课程的核心”，这跟我们说的改善社区和改善生活很有关系。另外，课标提出：“儿童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必须贴近儿童的生活，反映儿童的需要，让他们从自己的世界出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社会，用自己的方式研究社会。”关于教学方法，课标指出：“有效的教育必须采用儿童乐于和适于接受的生动活泼的方式，帮助他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的教育都是我们所渴望能给学生提供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我们在具体的制定学校的教学目标时，也会参考课标的具体要求。比如，语文的课标就清晰地列出了每个年龄段在听、说、读、习作方面的目标，我们也把这些目标作为了我们测评学生进展的标准。传统的应试教育才是违背了国家的教育大纲。做应试教育的农村老师，估计没有几个真的看过课程标准，思考过如何能够有效地达到当中提出的教育目标。

## 五、如何克服学生的困难？

新课程在乡村课堂不易实施，因为乡村学生没有经过参与式学习的训练，上课不配合，结果课堂时间完不成任务，或者活动开展不下去。所以我们把培养学生参与课堂作为一个专门的目标。培养目标主要是学生表达能力、思考能力、参与的勇气和合作能力等。我们去年开始用这种教学方法的时候，设定了一些阶段目标。最初只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大胆自信地在全班面前说话。在这个阶段，老师备课的时候就特别注重让尽量多的学生可以发言。每个班级也制定了一些鼓励学生发言的措施。很多班级参考了杜郎口中学的小组评分方法，把小组各个成员的发言情况作为最重要的评分标准。学校也举行了一些全校活动，让所有学生都有在全校面前展示的机会。这个基本目标培养了之后，就进一步要求学生发言要先思考，不能随便乱说。在这个阶段，老师经常让学生对彼此的发言给予反馈。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小目标来培养。现在使用这种方法的老师当中，基本上不会出现学生不配合的情况。如果提问，学生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做小组活动，学生会分好工进行。当然，培养阶段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来培养这些能力。但是我们认为这些能力本身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另外，既然这种教学方法要长期应用，在前阶段投入时间培养学生也是值得的。

## 六、如何帮助教师克服教学中的困难？

任何在农村做教学改革的人都会知道，时间紧张可能是最大的阻碍。我们合作的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所以相对来说跟孩子进行教育的时间更长。即使这样，老师们还会觉得很难准时完成任务。我们首先做的是给考试成绩一个新的定位。我们减少了考试成绩在老师考核中占的比例。更重要的是，考核考试成绩时，我们把排在最后的学生的成绩看成跟前几名一样重要。每次考试以后，学校不只是看班级的优秀率，还专门看学习最困难的学生有没有进步。其实，如果还有很多学习较慢的学生没有扎实地理解所学的知识，勉强地往前冲对大部分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没有好的影响，只能帮助班上最好的一部分学生。有了新的考核方法，老师要更多考虑大部分的学生，包括学习较慢的学生的需要。

另外，我们发现很多老师赶进度是为了在考试前可以留出三、四周的时间来做练习卷子。这不仅对我们想做的改革不利，也不是提高考试成绩的有效方法。所以，学校限制了老师让学生做卷子的时间，同时我们针对如何更有效率地提高学生考试成绩做了很多培训和教研活动。最后总结了一些好的归类复习和针对共性问题复习方法。这样，希望老师更有策略、更

有效率地为考试做准备，而不是盲目地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在反复做题上。

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经常鼓励老师用更有效的教学方法。我们提倡老师每节课都要有明确而现实的目标，所有的教学环节都要为这些目标服务。学校也把这两点纳入了老师的评价制度。以前，数学老师会把书上或卷子上的很多很多题布置给学生做，然后自己就坐在前面等学生做完。我们希望老师即便是做题也要有针对性地做，考虑通过做这些题想巩固哪方面的知识。现在，有些老师不像以前那样把书上一片的题布置给学生，而会考虑学生最需要巩固的是哪些概念，然后专门从不同的书上选出相关的题或自己出题给学生做。这些提高教学效率的工作本来不是我们最想做的。但是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进行课程和教学方法的探索，我们必须处理老师面对的这些现实问题。

用新的教学方法需要老师投入更多的时间，这是肯定的。但是，不同的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做到不同的程度。有些很小很小的改变，譬如在课上多让学生发表自己真正的观点，如果坚持长期做下去，相信对学生也是有影响的。关爱的老师很多时间是花在学习新的方法、思考如何做活动和找需要的资料。我想，如果有一些很适合农村老师的学习材料，加上一些很详细的案例，以及一些现成的资料，其他老师要做类似的活动的话起码不用从零开始。希望我们把我们的很多经验和材料整理出来跟其他老师分享以后，其他老师不用那么大的时间投入也能做出更多的尝试。

有的老师在开展教学活动让学生参与、互动、或者探索性研究的时候，很容易使课堂变得热闹但没有实际的教学内容，学生学习到的东西很少。我们开始的时候经常遇到这个问题，现在有时候还会有。我们的处理方法，最重要的是跟老师强调每节课有明确目标的重要性。你能看到我们在评价课堂的标准当中，头三条都是关于教学目标的。我们希望老师把注意力放在目标上面，而活动和教学方法只是手段。

第二，课堂管理是很重要的。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就会发现以前的课堂管理方法不适用，要想一些新的办法。尤其是做一些要动起来的活动时，我们会制定一些很详细的规则(classroom procedures)。比如说，做实验的时候，实验材料怎么发放，怎么收回来，做的过程当中每个组员要负责什么等等，每个学生都必须很清楚。我们在 youtube 上有一个关于关爱的一节实验课的视频。你看看这个视频就能看到学生一个一个都是聚精会神地参与。如果让学生展开有意义的探索，大部分学生都会非常投入。

用一些新的方法就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我们通过教研会以及我们跟老师一对一的交谈会比较细致地探讨一些教学问题，避免只是走形式而没有起到教学作用。比如说，有一位数学老师尝试在课上让学生当老师，把题分配到每个组，由组员给其他同学讲题。讲完后，其

他同学可以向组员提问或者指出他们的错误。这种想法听起来很好，但是做的时候就发现问题。有时候讲题的学生犯了错误，其他学生不一定能注意到，结果错误没有在课上处理。还有时候其他学生追问问题，组员一直回答不上来，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因为当时我们经常听各个老师的课，所以很快就发现了这位老师的课上出现的问题，并跟她讨论了一些解决的方法。

在带领学生做活动方面，刚开始老师们是有一些困难。关键要培养老师有探索性活动的意识。做活动的经验多了，做活动之前就能预想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哪些，然后在教学设计中要考虑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不同的种类：有时候是纪律问题，那就像我之前说的，必须在活动前给学生非常清楚的规则和指示，让他们知道每一步每一个人要做什么。有时候问题是学生会活动中忽略一些重要的细节，这在观察活动中尤其普遍。那么，老师就需要在做活动之前告诉学生，或者让学生来讨论活动中要注意观察的方面。如果是三年级或者以下，最好设计好一个观察表，用来指引学生的注意力。最常见的问题是学生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或能力去很好完成一个活动。比如说，我们要学生去做访谈，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设计采访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问题。那么我们必须在做访谈之前给学生这方面的培训。

但我想强调，我们在关爱做的一些教学改变不是以活动为主。如何提改善平时的课堂教学也是我们去年很重要的工作。至于活动的次数，这很大程度上是看老师的意愿。一般来说，社会和科学课做的活动会比语文和数学课多。活动的时间也会很不一样。有的是半节课、一节课，最长的维持了差不多两个月。除了这些特殊的活动之外，我们也有两个长期的课外活动，就是课外阅读和校报。我们也开发了一些国家课程以外的活动，但这些主要是在课外的时间开展的。永济市的教育局规定了每所小学每天都必须要有一节阅读课，让学生阅读课外书。于是，我们给关爱学校买了很多孩子爱看的课外书，成立了一个图书室，这两年多来一直在跟老师们一起探索如何激发学生喜爱阅读、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我们发起了关爱学校的校报，报纸的名称、内容、排版等等都是由学生决定和编辑的。我们还在学校开了一些兴趣班，比如：英语角、扯铃、跳绳、下棋等等。

## 七、学校图书馆

刚开始做图书室与阅读项目跟几个学校合作了，尝试了各种选书的方法和购书的途径。当时我们还想到想做一个高质儿童书的数据库。后来觉得我们在这方面不很专业而且不能投入很多的时间，现在主要是由红泥巴给我们配书。他们对各种类型的书都有很广泛的了解，



而且知道孩子最喜欢的是哪些。我们每次买书前会问各个老师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类型的书，然后转告红泥巴。他们配好了会给我们书目，如果我们有人在北京的话，他们还会一本一本的给我们介绍，如果需要他们也会根据我们的要求调整。

我们希望能够培养老师的阅读习惯，但是现在还没有做到。去年，我们和学校想让老师轮流分享一本书，但是老师都不愿意。这学期，我们让老师分组，我每个组读同一主题的书，读了一个月之后讨论。第一轮的主题是陶行知、杜郎口和阅读教育方法。明天是第一次讨论，所以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但是我已经听一些老师说她们还没有读完一本书。我们在图书室有不少关于教育教学的书。现在做到的是让本身有意愿看书的老师有好书看，但是对于本身不太喜欢看书的老师没有很大的影响。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比培养老师的阅读习惯要容易很多！

图书室的运作是有当地一位老师负责。王老师是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因为她对课外阅读特别感兴趣，所以一直是她在负责图书室的管理。乡村教育促进会以前没有专门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人员，但是我们会配合王老师。今年，学校又有一位老师参与图书室管理（李老师，一年级数学老师），而我们有一位工作人员（孙传美）专门做图书室方面的工作。主要的执行工作还是由老师们做。我们主要是跟她们一起讨论方案、做记录、提供信息资源等等。如果我们离开了，王老师和李老师绝对能够继续管理图书室。

## 八、教学评价方式的挑战

目前来说，我们主要是通过对学生的观察以及学生、老师和家长的反馈来评价我们工作的效果。很多人来我们学校参观都会说我们学校的学生非常活跃，会大胆地接触陌生人，还会问一些让大人惊讶的问题。比如，有一个五年级的学生得知一个志愿者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后，问了她一连串关于各种货币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一些以前非常厌学或者非常有困难的学生改变最明显。有个学生在我们开始教改之前在关爱读三年级。他一整年没有对老师说过一句话，写字不知道要从左写到右，最简单的字都不会写，上课时好像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从不参与课堂。现在，他还会举手主动到讲台上发言，而且在各个科目的成绩都有了进步。他的改变是两年前难以想象的。还有一个女生去年从别的学校转到关爱。她以前的老师告诉我们她很少进课堂，一天都在操场上或树上玩耍。在我们学校，她每节课都在教室里，大部分时候会踊跃参与课堂，成绩有了进步，她家长说她在家里更自觉，她村里的邻里也给她的家长反映说她比以前懂事得多。

有些改变是在学校普遍能看到的：我们学校的学生特别热爱看书。在课间、饭后和休息的时间，从一到六年级每个教室里都能看见学生在阅读课外书。我们的学生也很有好奇心，很会主动地争取学习的机会。比如说，老师发现一棵树上长了虫子，不久就有一群学生每天去研究这棵树的虫子，他们最后还成功地把虫子灭绝了。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比较主动，敢于给老师提出建议和要求。在课上，很多同学能够自信地、有条理地说明自己的意见，并说出理由。他们还会大胆地提问和挑战别人的观点。他们学会了如何跟其他人合作。让高年级的学生分组做事，他们很快就会自己做好计划分好工，互相督促，遇到冲突的时候也能想到一些解决的方法。老师们也会对我们反映他们观察到的改变：比如四年级的数学老师说学生解决应用题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二年级的老师看到了学生的阅读能力提高了很多，能够阅读很多在课上根本没有接触过的词句、英语老师发现学生能把学完的单词和句子记住，而不像以前那样学了没多久就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对学生和老师的进展的系统评估。我们尝试过一些方法，但是最能真实反映学生和老师的改变的一些方法，如课堂观察和访谈，需要的时间太多，我们尝试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没有能力长期做下去。其他的评估方法，如问卷、笔试等，我们又觉得不能很真实准确地反映情况，很难利用这些数据下结论。另外，因为我们没有参照的对象，即便学生和教师有了进步，我们很难说明这些进步就是我们工作的结果。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外部的支持，帮助我们建立更系统的评估体系或者对我们进行外部的独立评估。

## 九、NGO 从事农村教育创新需要哪些条件？

从我的经历来看，我认为在学校的层面上，最重要的是校长的认同和老师渴望改进的心态。如果他们不知道方法或者缺乏自信心，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指导、信息和培养。我们学校有一些很有开拓精神的老师。他们以前学习成绩不一定非常好，但是当他们接触到一些好的理念和方法，他们会很快地把这些外面的信息转化成为适合自己和学生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的英语老师通过培训学到了一些在初中进行小组教学的方法后，她马上就开始了在自己的课上尝试。当然，初中生的自学能力比小学生的高，所以在培训中所学到的方法不能直接搬到关爱使用。过了不到一个学期，她就能很自如、很有效地在四到六年级的教学当中运用小组学习的方法。有些老师没有心思去反思自己的工作，或者不相信一些“差生”也能很好地学习，那么无论我们有多可行多有效的方法他们也不会考虑。学校的稳定性也很重要。教育是长期的工作，如果老师和学生流动性很大，我们就没有机会持续地影响他们的成长。



在我们工作者的层面上，最重要的是能用一种很尊重、很敏感的方式去跟老师合作，擅于发现并帮助老师发挥他们自己的智慧。工作者不能有效地工作，往往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老师现实的困难、对老师要求太高、或者得不到老师的信任。工作者还需要有教学经验，要不然会很难跟老师对话，也很难设想老师教学时所面对的情况。另外，我们需要非常主动地学习和反思，因为我们的工作中，每一步都会遇到想不到的问题。

能得到家长和学生的配合是最理想的，长远来说得到家长的支持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无法选择学生和家。我们只能跟家长沟通和交流，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和努力争取他们的认同和支持。

附：<http://www.youtube.com/watch?v=Ix0ubjt9kxo&feature=channel>（关爱学校的一天）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54SxSTg2io&feature=channel>（一堂实验课）

## 西部支教日记（三）

周忆粟

### 教学笔记 9

#### 老师的尴尬处境

教师节的时候，同事们给我看过这样的一条短信：

上联：听狗叫看猪脸课时加重收入在减

下联：教畜生哄羔蛋生不逢时毁人不倦

横批：人民教师

虽然大家都知道其中有多少戏谑的成份，但是这也多少反映出一些老师的思想以及怨气，当然还有他们尴尬的处境。

偏偏就在昨天，我听三年级的一个学生说，他们的一位英语老师嘴很凶，经常说学生“教你们还不如教猪狗”，我听了以后很吃惊，也很惭愧。吃惊的是如此侮辱人的词汇竟然还有人使用。惭愧的是我知道，这位老师，作为教师群体中的一部分，确实在给老师这个职业抹黑。

可是我自己站到这些老师的立场上，能理解他们的境遇。我是一个志愿者，不会在这里长久等下去，终究会回到城市。可是对于老师们来说，他们的生活何时能够得到改善，教学环境什么时候可以好一点，却似乎是遥遥无期的。想想这些老师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只拿 500 多块钱的工资（经常还不能按时拿）。学生的底子又差别太大，差的学生实在是难教（诸位没有亲眼见过无法体会）。长期在这样的环境，焉能保证不出几个这样的老师呢？

但是我还是相信学生总是有闪光的地方，我绝对不要变成那样的老师。

#### 老师的嗓子总是嘶哑的

补课的日子，学校都是把两节课并一节课上的，就是那种一个半小时一节的大课。因为大学里面都是这样，所以我也没感觉什么。不过龙龙今天从早到晚的课都是满的！从早上 8 点到下午 3 点半。竟然没有休息，全部都是课。我看了也只有咋舌的份。想想这样的课业，新东方老师也小巫见大巫吧？龙龙？下午回来，嗓子几乎全部都哑了。的确，我平时超过 4 节课（小课）嗓子都受不了，他这一天折腾下来，不成公鸭嗓才怪呢！

说到老师的嗓子，我想起了他跟我说的一件事情。听说凡是来学校的女老师，第一学期的嗓子都是脆脆的，但是后来都变成了嘶哑的嗓子。我一想果然如此，我认识的女老师们，不管是我们班的班主任或者是其它教英语的老师，嗓子都有点哑。原来新来的老师第一学期都必须兼很多的副科，一学期折腾下来，嗓子自然受不了。不过根据我平时的认识，在教室里，不大声不行，因为教室大，同学多，学校也不可能配备话筒，不大声后面听不见。久而久之嗓门也都练大了，当然代价就是嗓子都不行了。

小房说她现在只有每周回家的两天嗓子才是好的，因为说话少。到了学校，上到星期四就撑不住了，因为她那天下午连着4节音乐课！——我看谁都受不了。跟我一批进来的年轻老师，哪个不是像她那样一星期近20节课呢？要不是不用像音乐课那样用嗓子，我看大家都会哑掉。

### 一笔糊涂帐

学校最近惹上了官司。事情的起因是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向学校索赔“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理由是我们学校没有雇佣残疾人。按照《陕西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中规定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它经济组织”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残疾人就业，从而认定学校违反了这条法规。要求学校赔偿残联2万多块钱。

这件官司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冤案。为什么？因为学校并没有人事任免权。学校所有的人事任免都是教育局决定的，学校只是执行。此外，学校也不是经济组织，并不受到《办法》的约束。但是残联偏偏不告教育局，找上了学校。而教育局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也颇为暧昧。并没有讲明白一定支持学校，或者出面调解。

但是就是这样一件古怪的案件，法院居然判残联胜诉，要求学校付他们近3万元。我以前写过介绍学校情况的文章，看过的朋友们就知道，这个学校一年的行政开支费用不过4万元，赔给了他们，学校怎么过日子呢？就今年来说，在实施了两免一补的政策以后，学校可以支配的经费大规模减少。只有3万不到。可想而知这个案件对于学校的影响有多大了。

我开始很奇怪，残联为什么会找上学校呢？为什么它不找其它的单位？后来终于知道，事情的根源在于，区政府每年给残联的预算无法到位，于是残联自己想办法了。找教育局可能不方便，于是把主意打到了学校的身上。而法院的判决偏向了残联。而且，在此之前，残联已经用相同的手段向附近的几所高中成功地要到了钱，现在它开始把眼光瞄向了初中。

殊不知，对于高中来说，一两万根本不算什么。在这里，一所好的高中收的择校费，针对一个学生就可以收4000—6000元不等。所以2万元也就是多收几个学生的问题。但是对

于属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初中来说，这些钱就可以完全要了我们的命。为了这个事情，校长最近几乎没有停过，四处找地方反映。

这件事情反映出了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这些困境有的是来自教育体制内部，有的是来自体制之外。但是这些外部的压力对于脆弱的学校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我们经常谈到基础教育的发展，但是像这样连“生存”的机会都要没有了，何来的发展呢？

好在这件事的结局是，当地 16 所初级中学的校长联名给市长写了信，由我们学校校长去向市政府反映，最后由政府出面制止了残联的行为。这样，法院的判决也就不了了之了，只是这场官司消耗了学校的大量精力。

## 重点高中

WN 市最好的两所高中是省重点 RQ 和市重点 DQ。这也是所有考生梦寐以求的学校。因为进了它们的门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重点大学。不过同事告诉我，这两所学校每个班级都有 80 个学生！高峰时期有 120 个人，而且一个年级都有 12 个班级。听了让我咋舌——现在不是都流行小班教学么？弄那么多人怎么上课呢？其实学校的逻辑很简单：因为高中已经不是义务教育了，可以收学费，一个学生 1600 元。如果是择校生的话一个 6000 元。所以学生收得越多，学校收入越多。因此学校已经越来越像企业了。这也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母校，一所寄宿制的上海市重点中学。听说现在也收了许多外地来的借读生，一个能收几万。这种现象在全国的重点中学都存在。因为它们在教育资源上的优势，很容易吸引到学生，而学校也能借此发财，何乐而不为？

教育资源的集中最后造就了一批“贵族”学校，这种情形不知道是不是领导们愿意看到的？反正老百姓是不愿意看到。更有意思的是，听说一些地方的教育局领导兼任重点高中的名誉校长。这一举动又颇让人寻味。很难让人不去揣测背后有没有教育资源分配的倾向性存在。

再说回那 80 个人的班级，我问同事的弟弟（他在 RQ），那你们上课能听懂吗？他说当然听不懂，还不是靠自己做题。80 个人的班级，比我们学校的还大，高中的知识又不比初中，这样能教好吗？学生能理解吗？同事的弟弟还说，除了班主任以外，其余的老师就没有能把班上的学生认全的。所以上课的时候经常有别的班级的同学顶替本班的来上课，反正老师只看人头，不认脸。而且因为人多，经常是三个同学挤在两人的位置上。我越听越觉得简直像小说，而不是我所认识的学校。

如果说学校可以从如此大规模的学生人数中获利的话，那么恐怕辛苦的就是学生和大部分的老师了。学生受到的教育纯粹变成了灌输式——在如此大规模的班级中，老师怎么可能了解到每个学生的需求呢？同样，老师也很辛苦，因为批改一次作业起码要 160 人，这谁受得了！除非他们很草率地对待学生，这又是谁都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这个多方关系中，除了学校从金钱和名誉上可以获利之外，学生和许多老师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

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

### 初中教育的困境是否源于小学？

关于目前教学上的困境我已经提到过很多次了。除了班级太大这个因素以外，学生的基础太差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比方说 99 乘法到了初中还弄不懂，或者满篇的错别字之类的问题，都是非常普遍的。这让人不禁疑惑，他们的小学教育究竟是怎样的呢？目前我还没有走访过小学，所以只能凭借听到的情况大致拼凑出一幅小学教育的图像。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小学，并不是像初中或者高中那样几十个人的大班级。相反，现在的小学，最多也就 30-40 个学生，有的甚至只有 20 来个。计划生育是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以前我们的印象总是农村人不接受计划生育，喜欢多生。现在这种情况还是有，但是比以前少了很多。特别对于那些上过学的年轻夫妇，他们很少愿意生许多小孩。生育高峰的过去造成了小学生源的逐渐下降。我在这里还没有调查过并校的情况，这个以后再谈。总体上来说，小学生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了。根据我们校长的估算，再过 5 年左右，可能我们学校的规模就要缩减一半。

但是奇怪的是，班级规模小了并没有相应带来教学质量的提升。只听见老师们反映小孩子的基础是一届不如一届，却从来没有人夸奖他们学得好的。这是为什么呢？我现在只能给出几个方面的猜测。首先是教师质量不行。这个问题我已经听很多人提起了。小学上课的老师，许多并非正规师专或者师范毕业，有不少是从高中或者初中毕业以后回去教书的。因为从总体上来说，公办教师是不够的（这涉及到教育局有没有足够的工资来养他们），所以小学势必需要请很多的代课老师。但是仅仅以 100 多块钱的工资，是无法吸引到什么优秀的老师的，所以注定小学在师资力量上肯定处在最底层。听说甚至有村领导的亲戚连初中都没毕业就去教小学。这样的师资，能够教出怎样的学生呢？

其次，老师数量不够造成的兼课现象是很普遍的，反正小学老师语数外是通吃的，在专业性上肯定也不行。另外，许多老师仅仅满足于“不要出事”，就是说，只要把学生管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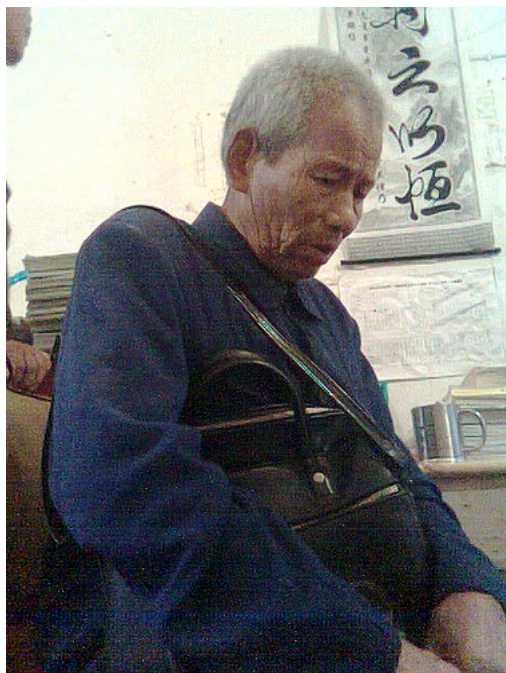


其它的事情也就算了。学生上课是也就比较随便。不过因为孩子小，老师一生气，学生也不敢怎样。小学的生活是很轻松的，不像初中老师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都盯着学生。一般的小学3点左右就放学了，学生都出去玩了。

小学教育质量不见提升的原因先总结到这里，其它等以后有了调查再添加。

最后说说我关于六年级设置的一点看法。六年级在上海以前叫预备班，设置在初中。在这里，六年级是放在小学的。我认为这样并不妥当。如果把六年级放到初中，由初中的老师教，我认为教学的效果会好很多。六年级应该作为一个过渡，帮助孩子从小学过渡到初中。比方说不管是各种课堂的规矩，作业的规范或者是其它的事宜，都在这一年中给孩子们灌输，这样的话从初一开始就不用花太多的功夫在无关学习以外的事情上耗费太多的时间。而且对于英语和物理这样的新科目，也可以有一个准备和适应的过程。

### 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天在班主任那里和她商量班上学生问题的时候，进来一位老人。那些天正好下雨，老人拿着一把老旧的黑伞，穿着胶鞋，跨着一个很旧的包。原来是班上一个学生的家长。这个学生因为不守纪律，被老师赶出了班级，家长是来求情的。

交谈中我知道那个学生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也照顾不了他。家里只有爷爷和奶奶和他一起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小孩容易变坏。这个孩子抽烟、打架，虽然个子矮小，但是听说是班级里的一霸。而且因为缺乏父母的爱，他在外面结交了许多“朋友”，有些是学校里的问题学生。和他们在一起，他经常旷课、撒谎、夜不归宿，还养成了油嘴滑舌的性格。这恐怕是因为他比同年龄的小孩更多地接触社会。班主任说我治不住他，让家长领回去。再说我们班级已经73个人了，是全年级最多的一个班级，那个学生又是插班生，我们完全有理由不接受他。

我知道班主任对这个学生是花费了不少心力的。为了让他树立责任感和信心，班主任曾经让他做了文体委员。不过一个礼拜不到，他又故态复萌，欺负班上的同学。班主任觉得不能让他一个人把整个班级的风气带坏了，所以要求他转班。

其实这个学生并没有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我的感觉只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和我们班上其它许多孩子气的同学不同，他在这个年龄已经很成熟了。爱使小聪明，经常在上课时头低着偷偷说话，一看到我瞪他马上坐端正，但是我一回头，他马上又开始。虽然是中途插班，但是他学习还可以，并且非常知道如何讨好老师。起码在我面前表现得挺听话的。但是那天看到他爷爷来这里，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老人家住在山区（我们这里叫塬区，算半山区），那天早上很早就从家里出来。因为还没有公共汽车，所以他徒步从山区走了下来。其中的辛苦直到后来我自己去了上面才知道。那天又下雨，他穿着套鞋，踩着泥地就这么走来。从山上走下来，起码要一个多小时，老人家天还没亮就出发，一路跋涉到学校。

班主任说尽了她的苦处，孩子不听管教啦，欺负同学啦，跟老师油腔滑调啦，把风气搞坏啦。老爷爷在这段时间就一直低着头，好像做错事情的是他一样。罢了，班主任说我不能收他。老爷爷叹了口气，说老师你辛苦了，娃的情况我也知道了。我们老人家没有把他管好，错在我们，请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听到这里我心里特别难受。哪个家长不爱自己的小孩呢？除了父母（这里是爷爷）以外，谁还会为我们受那么大的委屈？其实班主任也是嘴比较硬，心地很软，她最后还是收下了那个学生，并送走了老人。

现在上课的时候我经常留意那个孩子，他还是和往常一样地闹。我知道在他那个年纪是不会懂得体恤父母的爱的，但是我希望有一天他能想起这个为他付出的爷爷。

## 没时间观念

这一点我这个礼拜体会最深。10.1长假结束以后，8号第一天上课。可是直到8号的早上，学生都到了学校，领导们还没有决定到底上哪一天的课。那时候我正好在校长那里，听到了经典的对话。

校长：“哎，你说今天上星期几的课？”

副校长：“你说！”

校长：“那就上星期四、星期五的吧。”

停顿一下。



副校长：“不行。”

副校长：“星期四我课多，上星期一的吧。”（不知道我有没有听错，不过是肯定听到的）

于是我们就上了两遍星期一、星期二（今天重复）。据说去年暑假的时候，都放假了还没有通知老师们什么时候开学！只有各班的班主任知道，但是任课老师都不晓得。今年 10.1 也是，直到 9 月 30 号下午最后一节课，学校领导才把全体老师集中起来布置假期安排（还没包括 10 月 8 日的课）。

平时每个星期一晚上都要开会，开会的时间本来是等 8 点初三下晚自习后，不过一般都要推迟 30 分钟。总之校长没有通知开会，就没人去。

按照学期计划安排，本周应该举行初一年级的英语口语比赛。但是直到今天（星期一），连每个班级要有多少人参加、要准备怎样的节目、节目长短、主题，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了几次教研组长，都说“开会再讨论”。看来要拖到最后一天才能知道。

长期下来，老师们都习惯了拖拖拉拉。也习惯了打“无准备”之仗。而且造成老师们没有什么激情——反正最后不管怎样都是领导说了算，我何必要那么费力呢。

## 教学笔记 10

### 当体罚成为一种习惯

小房告诉我，从开学到今天不到两周的时间，她已经从坚定的“爱的教育”的信仰者变成了“这些学生不打不行”。她告诉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开学的那两周对学生太好，把那些小孩都惯坏了。要是在第一天就打两个学生，肯定效果不一样。比方说我们 6 班的班主任，也是她班级的语文老师，第一天就说“你们这些人，给脸不要脸”然后扇了两个学生，后来上她的课，完全没有人敢造次。

小房说她还听过其它老师更多更难听的土话，她都学不来。我听了很难过，但是却想不出办法帮助她管理班级。毕竟我不是班主任，没有切身的体会。想想那时候我们是一同进校的。现在才 2 个月不到，在她和 ZTY 的身上就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现在她们自己都不敢想象究竟是什么让她们转变。这就是环境塑造的力量吧。而且她现在都变得有强迫症了，一去上厕所，就想着顺便去教室里看看，有没有学生捣乱。现在每次她一出去不回来，我们就晓得她肯定去教室了。

有一点我听了很在意：小房说她以前在初中的时候，一个班级 90 个学生，当然学校是在 WN 市区。那么多学生，纪律却不像现在这般难管。这也就是说，班级的规模并不是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必然条件。那么就让我想到，还有其它什么别的原因呢？我一直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家庭因素。城市的孩子各种约束比较多，规矩做得早。而且父母一般都会讲道理（这与父母的文化程度有关）。但是农村的孩子很少约束（特别是男孩），家里也一般不讲道理，碰到不对就打。所以他们对于讲道理的方法并不接受。但是这一点又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改变的。这就造成在学校这个空间中两种不同的文化造成的冲突——现在很明显的体现在我们的身上。

在抛开硬件环境约束进而分析到软环境的时候，可能更难改变。这就好像是说，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惯一般已经困难重重，更不要说改变整个大的环境了。但是很吊诡的是，我想到能够改变这个方法恰恰是从孩子们开始——只有他们自己被逐渐改变了，他们才有可能去改变他们的下一代。但是如何从他们这里得到突破呢？

我现在一般还是采取比较柔性的方法。我用过最严厉的词汇是“再说给我滚出去”（那是因为一个男生用脏话骂了一个发言的女同学），这还不是在自己班上讲的。在 6 班，现在基本不会有纪律方面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班主任的管教。所以我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我用的方法比别人的更高明。而且根据我在其它班级的教学情况，我的教学方法（当然和学习的内容也有关系）最多能够摆平一半左右的人，所以我仍然心存疑惑。

## 困扰

这次并不是学习上的事情，而是生活习惯上的冲突。事实上，在来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应对不同生活习惯的准备。这个冲突直到现在才到来，已经出乎了我的意料。

在学校的生活，公共时间和私人时间之间并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上班工作”的概念是不存在的。老师的职责是随时随地地处理发生的任何事情。同样，“隐私”也是几乎不存在的（当然男女之间还是有），因为不断有学生、同事会进入你的房间。不管是有事情找，还是聊天，都是这样。我经常在写作到一半的时候被迫停下，因为进入房间的老师总会有意无意地盯着电脑看看。而我又特别不习惯在别人的注视之下写东西。

其实这些都还好，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自己的时间经常被别人的闯入而打断。以前说过，学校老师的生活是很单调的，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生活。这对于 20 多岁，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老师来说可能是尤其痛苦的。所以串门聊天就成为了最常有的活动。年轻的老师经常跑到我们的房子里找跟我住一间房子的龙龙说话——他是一位人缘非常好的人，主要是他乐

天的性格可以帮助你化解生活中的烦恼。。可是他们来串门，一说就是几个小时，要是再加上抽烟喝酒（龙龙自己倒是不会抽烟也不喝酒），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晚上的时候我经常犯难，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安静的环境。谈话聊天我已经受不了，更何况满屋子的烟呢？但是学校又没有专门的办公室给老师办公，除了自己的房间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去。所以只好跑到别的比较安静的老师那里去。其实说话我也并非不能接受，只是他们的话题实在提不起我的兴趣。天南地北一通胡侃就算了（昨天讲到了美国和中国要是打仗谁会赢），有的老师就是喜欢从东家长说到李家短，谁谁谁干吗啦，谁谁谁去哪里工作。每天重复这样的话题我真是头疼。还有的时候大家干脆就不说话，全部躺在床上，当然也包括我的床，抽烟发呆，什么事情都不做。或者兴之所至，去外面买很多的酒回来一通狂饮。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觉得一个人待着（很多老师一个人住）无聊，晚上就睡在我们的房间。一直能说到半夜里。偏偏我是个把睡觉看得很重的人，别人打扰我的休息是很痛苦的。但是没办法，我又不能把人家赶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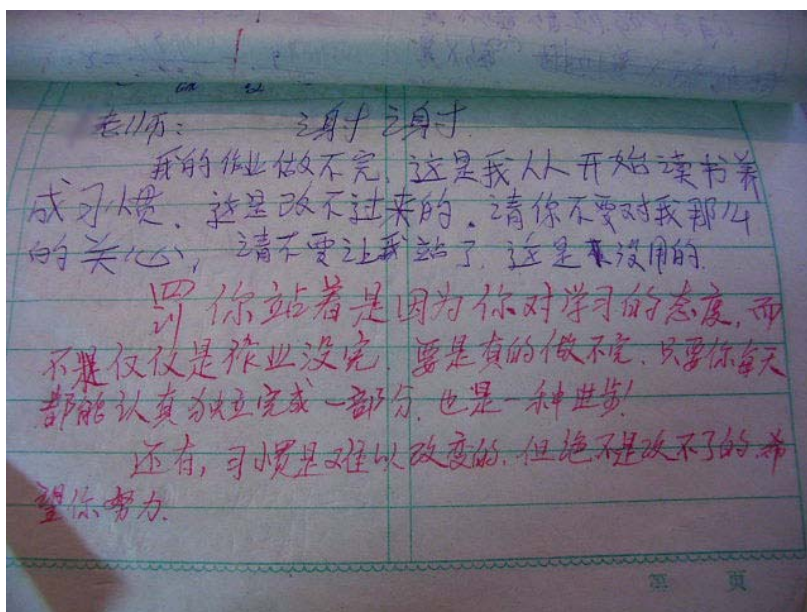
我想城市和农村很大的一点不同在于，城市的生活被严格地划分为工作和工作之外。个人的生活也因为地域的限制被分割成私人的和公共的。长期的城市生活让我养成了十分重视个人时间，也就是所谓的私人空间。我没有办法容忍被无端地打破自己的作息时间（不知道这算不算个人主义），特别是在工作日子里。如果周末放假那倒无所谓（不过也不喜欢）。

但是在这个学校却没有办法，我只能适应。

有的时候我想，不知道一种生活方式是否也会决定各人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呢？虽然评价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难免涉及到价值判断，而各人的价值观又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但是如果我想这么说，在农村的这种闲散的生活方式也会造成诸如懒散或者无所事事这样的生活态度，是不是可以呢？大多数的老师就这么日复一日地聊天说话，在我看来这样并不会取得任何的发展。当然我这样说难免苛刻——造成老师们这样的生活方式的，除了农村本身的环境氛围以外（就好像不守时一样），也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缺乏各种其它的选择。因此他们久而久之也就放弃了主动的寻找其它可能性的态度。

但是我能够说他们是不对吗？我想也不能，我说上面的这些可能只能说明我们价值观的冲突（当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却不能判定一定是他们“劣”。更有现实意义的可能是如何在两种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找到一个调和的平衡点来找到各自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吧。

## 一个学生的作业



这不是我的学生写的，是龙龙老师的。一个初三普通班的学生留言：

“老师：谢谢。我的作业做不完，这是我从开始读书养成（的）习惯。这是改不过来的。请你不要对我那么关系。请不要让我站了，这是没用的。”

看到以后心里五味杂陈。究竟怎样的教育可以让一个 15 岁的孩子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呢？我不知道他的人生会是怎样。但是我相信有问题的绝对不只是他自己而已。

## 在两免一补中的一些情况

班主任出去考试，把班上的事务都交给了我。正好星期五的时候要把班上贫困生的资助申请表收上来，也让我有机会了解一下班级里学生的家庭情况。

表格的全称是《陕西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申请表》。这就是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在实施中的正式名称。具体的操作我不是很了解，似乎是凭家庭的申请，然后学校把学费退回。但是正式的表格直到今天才填。

资助的原因有以下 7 点：

1. 父母双方或一方亡故，父母身患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
2. 父母双方或一方残疾
3. 特殊原因丧失劳动能力
4. 独生子女，双女，绝育导致经济困难
5. 因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及其它突发事件导致经济困难
6. 低收入
7. 因其它原因无力支付杂费书费。

一般来说，学生写的总是“低收入”，但是老师规定，不能总是写这个，不然会有雷同的感觉。所以尽量把家里的其它情况也反映出来。看了我们班同学写的贫困原因，我也不禁觉得心酸。一般他们的家庭人均收入都在 300-500 元。而且家中都有不止一个孩子。本来就收入少，再多生，当然是雪上加霜。很多人看不起农村人生那么多小孩，认为是愚昧。我承认这种看法有合理性。但是我也想指出，在农村，一个男的劳力和女孩毕竟不能相比。再加上如果一旦遇到生病或者意外，那都会对农村的家庭造成灭顶之灾。

现在的农民已经有了买保险的意识，但是多是为孩子买的。家长买的很少。加上看病难的问题在这几年很突出，所以因病致贫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我们班上 24 个贫困生中，有 5 个左右都是这样的。

在城里的各位看来，“两免一补”的那点资金可能根本不算什么：一学期国家补助的书本费 63.96，省里补贴的的杂费 54 以及市级的配套资金 6 元。如果是住宿生的话还有 120 元的生活补助，加起来也不过 200 多元。但是这些钱对于那些家庭的孩子，可能是他们能否走向明天的一个重要的障碍。

但是我同样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些申请者中有些学生并非真正的贫困。比方有一个男孩，爸爸是机关工作人员，吃皇粮的，妈妈开了个小饭馆，而且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但是他依然申请了。这样的情况可能还有几个。我问他，看你家里也不是很穷啊，怎么就申请了。他说“能省则省嘛”（好精明的孩子）。然后我又追问，那你是怎么拿到申请表的？他说了句“官官相护”（原话！）。我一开始还不明白，然后又追问。原来他们这些孩子家庭大都是和学校有一点那么关系，以前可能给学校行过好处，那么这个人情或者是面子就在现在还了。虽然学校没有大钱，但是掌握了“审批权”，也能够在这个时候变相地成为一种资源。

相反，我们班上还有一个女孩是双女户，家里也不好，却因为名额的关系没有轮上双免。这就会反映出这个政策在具体执行时候的尴尬：需要补的补不上，不需要的钻空子。因为各地的双免生名额是有限的，也是根据地区划分配给的。所以有时候即便家里穷，但是你这个地区的名额用完了，也没有办法。而且我怀疑名额的限制和省里或者市里的配套资金是否跟得上也有关系。因为本地的经济有困难，无法提供更多的配套资金，所以只好限制补助学生的人数。（后来这种情况在对宁夏平罗县头闸中学——一个本来也是我考虑要去支教的学校——的了解中被证实了。那里 2005 年因地方财政困难，享有两免一补的名额是有限的。）

必须承认，两免一补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是我们在称赞它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它在正式执行中所存在的不足。



## 成人考试

周末的时候学校的许多年轻教师去参加成人高考。这也是为什么我周末和星期五的时候代了那么多的课的原因。学校的年轻教师们一共去了7个。

要说成考的文凭对于老师们来说有什么用，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总是觉得现在有个大本的文凭，以后找工作或者在学校升职的时候自己底气比较足。其实我觉得就老师们对于知识的需求来说，他们并没有动力再去学习更多的东西，比方说他们平时很少看书。文凭仅仅是文凭本身而已，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证明”。这不能不说是考试的一种悲哀。因为知识在这里已经屈居次席了。

而且我比较惊奇地发现，考前并不像高考那样老师们要闷头K书。事实上，真正有许多时间看书的可能只有那些副科的老师。如果是班主任或者主课老师，教学就忙得够呛，留给自己的时间就很少了。这恐怕也是他们没有什么动力学习的原因吧。以前和朋友说起过，工作了以后，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很少了，这话到了自己工作了才晓得。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到了晚上唯一的想法就是睡觉。真的还有毅力再通过自学学习到新的知识，我看是凤毛麟角。当然，反过来说，如果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都能够出成绩，足以说明那个人的毅力。在这有两点要强调，一是起码得想到要学点什么，二是通过自学。同时做到两点，真的不容易。

话说回来，和老师聊天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有趣的事情。原来成人高考这个文凭，并不是特别的“硬”。怎么说呢，因为考试中的水份很大！在这里的考试，不但可以把纸条，公式书或者计算器带入（当然考试规则上可不是这么写的），而且还更夸张的是，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这里甚至有的人都找人代考。为什么？因为自己不会做！比方说对于学校的许多老师，他们师专毕业（相当于中专），只学过初中数学。什么积分微分极限级数，根本不会——当然更重要的是，自己也没有学。英语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枪手”这个行当的生意相当好。我比较惊讶的是为什么考试当局会对考生那么松，这个问题没有考证过。反正听考试的人说，监考的时候人家根本不看你的照片和名字。在学校里不少老师找过我去代他们考试，都被我婉拒了。倒不是我正义感强，而是实在不想在外地惹是生非。后来听回来的老师说，他们考试时都拿手机互相发答案。英语一共61道题。除了最后的是作文以外，其它全部是选择——这样出题是不是也方便了作弊呢？高数的考场枪手是最抢手的，往往一场考试没完，就接到电话要他们去考下一场了。

所以从考试状况如此混乱我们也能知道为什么这文凭不值钱了：大家都用枪手，都过了，都有了也就没用了。所以许多人只是把这个作为以后参加自学考的热身。自学考不管从难度

还是考试的正式度上都和成考不在一个档次上。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和中国其它的许多考试一样，考试本身已经凌驾于学习之上了，对于考试的钻研超过了对于知识的理解。倒不是说看不起考试的人——我自己不就是这么过来的么？不过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对于考试深有体会。也许是时候该反省一下了。

另：昨天还拒绝了一个老师的亲戚要求代考经济师资格考试的请求。原因是，我真的不会这个，哈！

### 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吗？

我最近时常想自己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指的不是说我自己的人生，而是作为老师所做的一切。我常常不知道究竟怎样才是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做的？我应该传授给学生怎样的技能或者灌输给他们怎样的价值观才算正确呢？没有人告诉我这一点。完全凭自己的本能和想法来行事。我想这可能就是我还不是一个好老师的证明吧。起码在我的眼睛里，好的老师都应该是有着明确的道路和想法的，而不是像我这样一路摸索。

我倒并不认为做老师一定得有固定的模式，但是起码现在像我这样，常常是想到什么说什么，有时候甚至会互相矛盾。这样的形象展现给学生是对的吗？我总不能向孩子们解释：这就是人生，本来就是反复无常。这样的话似乎不够负责任。

最近在看马卡连珂的《教育诗》，很有意思的一本书。虽然写作的时间已经有80年了，但是我发现其中很多的场景竟然和我的生活有惊人的相似。等读完写读书笔记吧。

我发现自己作为英语老师，逐渐露出一个“学生”的痕迹了。这种痕迹就是对于题目的钻研可能比对知识学习的研究更深入。我想这是每个经历过如此众多考试的考生所共有的特点。当然也可能是新东方训练的结果，呵呵。学生问我的题目几乎都是砍瓜切菜——毕竟是初中难度。我拿到题的第一反应并不总是把题目读懂，而是先找关键词，前后对应之类。好像是一种本能一样。至于英语的使用，倒在次要。最近上课的口头禅是，“听不懂没关系。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再巩固”。好像我已经成为了“做题中心主义者”。题目至上，考试唯一。自己反省着，觉得那样固然是不对，毕竟一心沉湎于题目而忽略了学习知识是本末倒置。可我又应该怎么办呢？说实话我觉得，就农村学生的知识背景，加上现在这个教材，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实用性”——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英语学习的必要性真的存在吗？或者说，当下的这种方式，不管是教材，考试体系，都是正确的吗？越是这么想，就越是觉得除了教给他们做题的技巧和方法以外，我确实想不出更好的方法——起码做题对于部分人还是有用的，虽然只是小部分。



那么究竟怎样的英语教学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呢？我还不知道。

### 突发事件

昨天晚上在上网的时候，忽然有人告诉我学校的老师和一个学生打起架来。全校的男老师都去帮忙了。不过等我出门过去的时候，老师们已经陆陆续续回来。晚上向其它老师了解了一下情况，大致如下：

学校丢失自行车的事件一直不断。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昨天傍晚的时候，值周的老师们在校外发现了一个有嫌疑的学生，于是把他带回学校问话。根据他们后来回忆，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但是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那个学生突然变得很慌张。这是对面正好走来一个去年的毕业生（毕业了以后因为成绩不佳没有上高中，也没有去工作，而整天四处闲逛）。那个被嫌疑偷车的学生上前和那个坏学生交谈了几句，然后从衣服里面拿出一把砍刀给对方——原来这个学生藏着一把刀，所以才如此慌张生怕被老师发现。这时候同事 WM 走上前去交涉要求学生交还砍刀，但是对方不愿意。几句话不合，那个已毕业的坏学生就和 WM 厮打了起来。（据说是学生先动手的，不过天太黑，谁也说不清楚，总之肯定是在互相推搡和谩骂之中开始的）那个学生以前就经常打群架，不是善主。所以尽管 WM 也算魁梧，但是扭打中没有占什么便宜。而旁边的那个嫌疑学生觉得情况不好，撒腿就跑，两位老师跟着去追他，就没顾得上 WM（事后他们也说，他们看傻了眼，没反应过来）。最后那个学生见势不妙，用长指甲在 WM 的脸上留下了 4 条红色的血印，夺路而逃。

事后我看了 WM 的伤，脸上的伤痕还隐隐渗着血，几条红色的痕迹触目惊心。本来在镇上，学生打架就好像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凡是男生身体还可以的，就没有谁没打过架的。今年开学刚一星期，一个七年级的学生就在早上课间的时候跑到附近的小学殴打了一个小学生，用砖头砸了对方的头部。结果对方当场晕倒，到现在还在昏迷（送到西安去了）。而上个礼拜我还看见了学校初三的一群男孩子们去向附近学校的学生寻仇（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带了 3 把砍刀，但是没用到）。但是学生和老师发生冲突，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本来想说这里“民风强悍”，但是想来平时生活里面所碰到的人们好像并不像电视剧或者小说里那样一言不合就动手的。大多数人还是很理智的。但是为什么偏偏学校的学生就如此热衷于打架——还不限于男生，前天我们学校的几个女生被发现在校外围殴一个女孩子。这让我想了很多。在这里，打架已经超越了学校的范围，而升格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件。不但是学校，凡是十几二十岁的孩子都有这种经历，不管是目睹还是亲身参与。这里有几点值的注意。

1. 打架是否已从被迫无奈的抗争手段变成了一种常规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2. 社会环境对于造成这种现象所施加的影响。
3. 文化的影响
4. 如何解决

第一个问题我想只能认同。不管是群架或者说是两两之间的厮打，都每天发生在我的身边。所以我相信这种说法。第二个问题我想家庭因素也许起了很大的作用，就好像之前分析过的老师打学生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一样的。因为孩子在家里接受的就是“父母用拳头来教育”所以他们会很自然地再自己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也诉诸于暴力。第三点我想提一下电视剧特别是港台电影的影响。在和同学（特别是高年级）的同学的交往中，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词汇“马仔”，“大哥”，“小弟”。我问过他们这些都是哪里看来的。几乎都是港台影视中。特别是香港的黑帮电影对于孩子们的影响力巨大。因为在潜意识中电影给小孩造就了一种悲剧化的英雄主义情绪，他们逐渐认同了通过暴力来达成一件事情甚至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并且对于电影中的暴力场景印象深刻。

所以综合起来，形成这一事件的原因众多，如果想要解决，必须从多方面入手。首先是在家庭中，父母应该放弃使用暴力（这么说好像很轻松，但是我不会忘记许多孩子的家长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们没有别的办法管教小孩）。其次是重视各种媒体以及文化对于青少年成长的影响。电视和电影作为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的输出工具，发挥着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也是教育工作者认识不足的。然后，学校是不是应该转变自己在教导此类事件之上的方针？我们不能总是试图用高压的方式禁止他们做这个做那个，而应该充分解释、让他们理解打架这一行动背后所带来的各种后果。但是这也对于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首先他们必须理解和知晓这些道理。最后是社会教育的作用。很多情况下打架并不发生在学校。如何发动社区以及其它教育手段而非仅仅是学校来共同帮助孩子们找到更好的对待问题的办法，这一点非常重要。

上面说了这么多，我却不得不承认，能够做到的实在太少了。许多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也觉得对于青春期成长的青少年来说，究竟如何认识打架，进而认识“暴力”的本质，对于他们今后的成长又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该做的还是不得不做。

## 一个悲剧的开始？

昨天晚上来了一位木匠找校长。开始我还以为是关于做书架的事情。没想到他居然是为了一个学生来而来，而且偏巧就是我写过的那位让他的爷爷赶了十几里山路来的小孩<sup>1</sup>。他上周在教室里和同桌发生争吵，根据体育老师讲，他抄起身边的板凳就往他同桌那里砸。要不是老师眼疾手快，可能又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说不定。体育老师对他的评价就是“这小孩下手真狠！”后来他就被班主任赶回家了。因为是第二次，所以不原谅他了。

那位木匠是这孩子暑期做学徒时候拜的师傅。师傅有一个自己的作坊，平时还带着几个徒弟。那个学生从学校被“开除”以后回到作坊里继续学手艺。但是师傅说他实在不懂规矩，也不知道尊敬老师和长辈，所以骂了他几次。没想到他就此不去了，然后纠集了一群小混混三番两次到作坊里闹事，还殴打了其它的几个小学徒，威胁他们不准去学习手艺。师傅觉得他太过分，就来学校找校长告状。恰好校长不在。ZT 就把他带到政治处主任那里解决。

对这个小孩我印象还挺深的。他个头小，看起来并不是很坏，没想到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来，让人唏嘘不已。我知道学校里肯定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但是，难道社会就会给他新生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不知道他是否会加速沉沦。在城市里，我见过少管所，但是农村，离开了学校和家庭，几乎就没有别的力量可以约束他了——如果不犯法的话。那么对于这些孩子，联想起昨天说的打架的那些孩子，社会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 再出事故

这两天学校事故不断。前天发生学生和老师打架的事故之后。星期五的时候再次发生了车祸，这次受伤的是 ZT 老师。那天放学，他和一个朋友小聂骑摩托车回家，小聂载他。他们住在山区，要爬一段坡。他说那个时候速度并不快，因为要爬坡，一辆小型的卡车从他们的后面超车，转弯的时候车尾碰到了他们，因为他们质量小，所以一下子车就倒了，两个人都摔了出去，ZT 的腿被车压到，骨折了，小聂只有一点擦伤。车灯灯罩毁了，仪表盘也撞坏了。

听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惊心动魄，因为在那之前 5 分钟我还和 ZT 聊天，没想到一转眼，他就进了医院。更让我后怕的是，学校的老师，除了校长以外，都没有驾照和行驶证，所以说哪怕是出了事情，也是无证驾驶——我还坐过他们的车呢！当即决定以后如果不是没办法，绝对不坐摩托了。在农村地区的交通很是混乱。因为没有警察，人们也缺乏相应的交通

---

<sup>1</sup>编者注：见本次连载章节《可怜天下父母心》

法规知识，所以违章行驶、超车等等时常发生。暑假在黄羊川的时候，那农村小巴的司机就在大白天把汽车开到双黄线的另一边，并且当场爆胎，就已经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我更是对于交通心有余悸。

现在麻烦的事情在于，ZT 是全校课最多的老师，一周有 20 多节。他一病，谁来接替呢？首先是 2 班的班主任要找人，其次是他们的数学课，和整个 7 年级的生物课。想来我平时课比较少，恐怕也会分到不少课吧。

### 面对现实吧

刚刚把给孩子们测验的英语卷子改完了。实在惨不忍睹，全班及格的不过 10 个人，到是有一半以上的人达不到 30 分（100 分满分）。我越改心越冷，改到一半的时候就改不下去了——因为我把成绩好的学生的卷子改了以后，剩下的居然是连卷面上的空格填了一半都不到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这个结果，起码有一部分责任在我，可能之前我过于乐观了。

昨天下午和班主任促膝长谈了很久，看着花名册一个个谈班上学生的情况，一直说到身为农村老师的难处。有两点我听了进去。一是听说今年初一的英语老师之间竞争很激烈。我是没有感觉，毕竟是新来的。但是有老师铆足了劲要在期中和期末考试时希望自己的学生拿到一个好成绩，以至于每天都催着学生做题背课文。还有一点就是，与我们很多人之前的印象不同，许多的老师也对于目前这个考试制度很反感。不少人都能总结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虽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是很明显地，考试制度已经不只在学生的这方面体现出它的弊端。

这一点在我批阅完同学们的试卷以后有很深的感触。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考试与其说是对于知识的考察，倒不如说是一门技术。考试这种技术的锻炼，不仅需要老师的灌输，同时也要学生大量的练习来配合。如果说在城市中，还能够开展“素质教育”，由于学生的综合素质比较好，或者换种说法学生有比较多的知识积累（不管是从汲取途径上还是环境熏陶），并且学校有足够的教育资源，所以在正常的考点之外，学校能够进行更多种多样的知识点教学。但是在农村的学校中，“完成考试”已经变成了最高的，也是单一的目标。

为什么？因为农村教育的资源无法允许学校进行其它的任何活动。或者说，连“达成考试”这个目标，都不能完成。我在英语教学中就发现，对于一个语言点——或者说白了就是考点的讲授、理解、融会贯通，没有通过大量的习题和讲解，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当然也可以通过老师与个别学生单独的讲解，可是没有时间）。因为就考试本身而言，题目的形式变化多样，书本上单一的“语言现象”式的内容，是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部分的。为了举一

反三，只有做题。可是仅仅“做题”在这里都是一种奢望。因为不可能给那些孩子买很多的辅导书，他们无力负担。这时有两种选择，一是辛苦老师，老师们买许多的书，抄很多的题给他们做；二是只好放弃这个知识点全面的讲解。很多情况下是第二种情况发生，因为老师毕竟不是机器，精力有限，无法做到对每个班级、每届学生都如此投入。

所以哪怕是“考试”这个目标，都变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我在测验以后对于考试有了更多的理解。如果一个孩子的聪明程度仅仅是普通的话，也就是说他/她没有办法在课堂上一下子听懂所有老师讲解的内容（这是大多数人），那么只有通过习题，他/她才有可能补上这些知识。当然还可以是老师补课。不过，对不起，在这里，老师是稀缺资源，除非有关系，根本找不到老师补课。

仅就“考试”而言，城市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就完全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虽然考试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测试办法。但是其实，在起跑的地方，农村的孩子就被拉下了一大截。他们无法做大量的习题（习题竟然也成为了一种资源），没有参考书，无法参加补课。自然在考试这门“技术”上，是没有办法像城里的孩子们那样优秀的。如果按照这种逻辑，能够从农村的学校脱颖而出的，必定是有足够的天赋加上相当程度的努力才有可能。

但是请不要忘记了，还有更多的孩子是根本无法跳出这种“筛选”体制的。就好像我们班级，测验的结果，一个90分，2个80分，5个70来分，还有一些60几的，其它都是不及格。那些不及格还不是40,50多的，大都是30分都拿不到的。我觉得这些孩子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为什么？因为他们为数众多！因为他们是未来农村建设的主力部队。当初温世仁先生对于大城市、好大学的中心化现象表示了忧虑。在这样一个教育体制之下，各级优秀的学生无一不被大学所吸收。而那些没有通过“考试”这一关的大部分群体，却被抛弃了——至少是被正式体制所抛弃了。他们从初中毕业，没有任何的职业技能，对于社会的了解也仅仅限于平时的生活圈子，却被迫去讨生活。这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不公正，这就是一种社会排斥。

考试机制的导向性通过测验被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应对考试，为了帮助那些哪怕有一丝希望读上去的学生，我们被迫投入所有的心力——虽然我知道这种努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无用的。回到刚才所说的考试技巧的话题。考试的技巧是可以被锻炼出来的，而应试者却不必掌握广泛的知识。这是因为：一，考试的范围有限且是已知的，二，考题是有规律的。就这两点，导致了我如果一个劲的教他们考试技巧，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有5-10分的上升，但是对于他们生活，对于他们将来的人生，并没有什么帮助。



比方说我教导同学们，不管会不会做题，一定要把卷子全部填满了。拿到题目，一定要找到关键词或者关键短语，听力不会的话可以放弃。等等等等。这些应试的技巧是实用的，能够帮助他们提高分数，但是对于他们的英语学习，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作为一门语言的英语，需要更多的应用和变化，可是我却没有办法给他们这些。或者这样说，我曾经尝试着给他们，但是发现，这样做的后果只是耽误了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还是我上面说的，考试是一门技巧，需要的是熟练工。必须经过大量的题目，才能做到了然于心。其次考试的现实目的，在于从最短的时间内拿最多的分数。如果不熟练，怎样能够达到这点呢？所以我别无选择，哪怕全班只有不到 10 个人学会了，我就得教他们——我在考虑的还有，这种选择是否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认为进大学的“成功”比顺利毕业而没有读大学来得更重要呢？这种判断是如何来的？

基于这些考量，我就转向现实的一面，通过大量的练习和讲解题目来灌输这些知识。这是无奈，也是现实。也许我们能够跳出体制看问题，但是孩子们不能，他们只能活在这里面。因为他们一无所有。

### 幸好我不是一个犬儒主义者

虽然现实如此残酷，但是我想，我还是可以在现有的体制和环境下一做些什么事情的。恐怕这和我长期接受的教育有关吧，我不习惯看到一件事情无法改变就放弃，我想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就好像这个教育体制，毕竟为国家输送了那么多人才。而且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这种状况的同时（起码我没有能力制订政策），我想从其它的方面做一些改变，哪怕是微小的，但是对于学生的人生却可能是有益的改变。

其实我知道我这种想法也许很天真。但是，这可能就是一个教育者和一般的人不同的地方吧，那就是哪怕我只不过是众多随机因素中的一个部分，我也要尝试。因为不做，绝对不会成功，做了却有可能成功。而对学生来说，一点希望就是他们的全部。

因为 ZT 的车祸，所以 7 年級的课表全部重排，2 班换了班主任（本来是 ZT），小房不教 8 年级音乐了，转带全级的生物（本来也是 ZT）。这样的话，她的课陡然变成了 27 节/周，成为课最多的老师。我昨天还开玩笑说你可别过劳死啊！我就向领导申请让我分担她两个班级的生物。一来我生物一直学得不错，而来我对生物也很感兴趣。可是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我认识到，对于农村学校的孩子们来说，除了主课以外，副科也许是帮助他们拓展自己眼界的最好途径了。

以前我说过，许多农村出来的孩子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是知识面狭窄。到了大学以后很容易成为一种瓶颈，不但是对以后的学习，同时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也会限制他们的视野。许多的心理悲剧就是因为长期在紧张的学习中无法舒展自己的内心、找不到人倾诉而扭曲。现在当我开始了解“考试制度”是怎样一回事以后，我渐渐摆脱了对他们以前虽然谈不上鄙视，但是没有好感的态度。因为在这里，我和孩子们一起成长，一起生活，我见证了他们的生活中，除了学习以外，一无所有。农村的孩子唯一接触外界的途径就是电视（现在部分还有网吧），但是电视文化，说实话我一直心怀警惕。就像尼尔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写到的，这是一种本质为娱乐的文化，电视所传导的必定不可能是知识。而且孩子们有趋易避苦的倾向，他们更喜欢电视剧而非科教片（当然也可能是我们电视节目质量太低），所以电视不是一个好选择。但是除此之外就没了其它的途径。

图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积极的为学校四处找图书捐赠的原因。但是读书无法在短期内见效，它更多的是一种长期投资。如果有条件的话，计算机网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目前看来对于多数的地方，这只能是一种奢望，因为计算机牵涉到的东西太多（用电，机械损耗，管理）。所以在短期内，一位知识丰富的老师就很重要。他/她能够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带领他们探索知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对于科学和自然的兴趣是在小学的时候我的自然常识老师叶洲老师引起的。所以我对于老师的重要性有非常深刻的感受。我希望上生物课和其它的副科（地理，历史或者计算机）就是因为它们考试的压力相对比较轻，教师上课的随意性更大，可以更多地和学生交流告诉他们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曾经带过一节地理课，我拿了自己买的《中国国家地理》给孩子们看里面的图片和地图，他们非常快的就掌握了这些知识，并且对于地理的兴趣马上从单纯枯燥的课本文字上升成了感性的认识。

我知道目前没有可能让每个老师都做到这点，但是我起码可以从自己开始做，让学生多知道一点。我想下一步是回到上海以后，设法买一些或者问人家要一些科普杂志和书籍，提供更多的给孩子们。

事在人为啊！

（未完待续）



## 世界、学理与自我： 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sup>1</sup>

项 飏

学术理论、地域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错综复杂。对这些复杂关系的把握，乃是学术发展和突破的前提之一。王铭铭教授(2000)认为中国人类学对海外世界失去兴趣，而越来越注意农村社区，是因为人类学被“国家化”了。因为人类学家希望为自己的独立民族国家建设服务，从而研究的关注点越来越内化。今天我们重新要把自己的思考和视野世界化，则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逆向运动，即“去国家化”。我们的世界已经和过去的世界有本质不同，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其实20世纪的“国家化”本身，是一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世界运动”之一，即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民都以建立、建设独立民族国家为己任，从而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因此，要发展新的人类学，我们必须对影响我们社会进程和日常生活的种种重大历史力量有高度的敏感。而正因为这些历史力量是极其复杂的，学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能被抽象地理解，更不可能用普遍的逻辑图示来勾画。它只能通过具体的学术实践来把握。回顾我在2000-2005年对印度计算机工人的国际流动的人类学调查，它不仅是学术上的抗议，也是政治上的抗议，我不仅是在知识生产的世界体系里穿行，更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上穿行。但这决不是要否认学理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学术活动受权力关系影响，但是显然不是权力关系的被动反映。我们正是要通过对政治经济关系的反思来发展学理，而新的学理的意义也正在于它能够提供观察、批判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本文将以我个人的研究经历为主线，描述我究竟怎么做了这项研究，同时我个人的经历又如何反映了更大的制度性关系。

### 牛津乌云

我受我在牛津的导师彭轲博士的鼓励，到牛津大学学习，而没有到北美，我对此感到幸运。这并不是因为牛津给了我系统的训练，恰恰相反，幸好牛津几乎不提供任何训练，博士

---

<sup>1</sup> 本文是作者《生产虚拟：全球IT产业中的印度“猎身”劳动体系》（王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英文Global “Body Shopping”：An Indian International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的《跋》的一部分。

生不上课也不考试，只要求交最后的论文。如果牛津要象北美大学那样要求，我很可能早就精神崩溃。首先是我的语言问题。因为我成天忙着浙江村的课题，无心强化英语。去了一次新东方，感觉是进了气功班或者其他神秘活动的讲演会，落荒而逃。（当时大学生里流行一句话：“不考 GRE，你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据称语出新东方校长。我在印度村庄里调查看到村墙上著名的印度全国信息技术培训[NIIT]的广告：“如果你不加入 NIIT，你的人生将失去了什么”！）初到牛津，基本的会话都无法维持，不敢去听课和各种讨论会。我最近碰见一个当年同届的英国博士生，她告诉我，那一群学生在背后认为我是他们中间最大的谜。

除了语言，同样让我难堪的是我的知识面。很多在其他国家属于中学生水平的常识，比如以色列问题、巴尔干问题、印巴问题等等，我都知之甚少。原来总以为自己缺的是“理论”，而现在意识到，我的基本知识信息的匮乏的问题不比理论薄弱的问题小。这使我深刻体会到专业学术研究和公共信息传播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我虽然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国内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导依然极其有限，分析和评论基本不存在。媒体对国内的报导也是日复一日用同样的话语，信息量少，更谈不上分析性或者批判性了。我是到了英国之后，挣扎着看点报纸和电视，才第一次体会到实证信息的力量，体会到，调查、分析、辩论、反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工具，而是民主社会里大众的自然要求。我反复感慨，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学者们自然要刻苦工作，系统搜集数据，发展严密的逻辑，以和别人的观点竞争，面对公众的拷问、经受历史的检验。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平归根到底要靠社会环境来推进。近 10 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有重要的发展，选题越来越真实，分析越来越深入，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整体思想环境的变化而推动的。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所谓“左-右”的争辩，以及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专业性媒体，给社会科学界带来新的生机。

我语言不行，知识有限，可又偏偏给自己加压，要掌握人类学的理论“真谛”。这个压力直接来源于当时国内社会科学界的理论焦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二，如何重建国民经济和社会规范？对前一个问题的探讨多半集中在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通常是宏大叙事，高度抽象。而后一个问题则要直接干预政策设计，要做方案，出规划，其中最活跃的通常是有理工科背景的学者（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见 Greenhalgh 1986; 2003）。这两者在实践中完全可以并存而不矛盾，很多活跃在 1980 年代的知识精英（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称他们为“老精英”，虽然我们也说不出来谁是新精英），就在二者之间来回穿梭，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居于哲学思辩和政策设计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业社会

科学研究处在边缘地位。到了我进大学的时候(1990年代初),情况开始有明显变化。一方面,国家在1989年之后加强了对意识形态争论的控制,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巨大的风波之后也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争论失去兴趣。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成为技术官僚的道路一度受阻,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学院工作者视专业化的实证学术研究为其主流活动,专业上的自主性成为主要的追求。当我们要建构自主话语的时候,我们猛然发现可资利用的专业性理论资源相当有限。比如,我们对一个事实现象应该怎样在概念上界定,在方法上从哪里开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积累。于是导致了对西方理论的深切渴望,和对自己不足的莫大焦虑。“海归”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受到学生的额外尊敬。“你用的是谁的理论?”成为了一个甚至在闲谈中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说不出一些大人物的名字就将会是一种尴尬。大量的西方理论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不少的翻译生吞活剥,无法卒读。(比如,我自己发现的一个令人吃惊又叫人捧腹的例子是,哈贝马斯一本书中的“后现代主义”被译成了“邮政现代主义”!)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对理论和貌似理论的说法似懂非懂,反而更觉得神秘莫测,妙不可言。因此,到牛津读博士在当时也不算是件小事,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把它看成是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要去寻求人类学的“真经”。

牛津在表面上满足了我的理论饥渴。当时的西方人类学正流行所谓“流散国外”(diaspora)的说法。“流散国外”宣称要重新思考民族国家、文化、历史、认同等等。它把人类学从1980后期开始的文学化或者文本化趋势推向极端。用相当复杂的语言层层缠绕,无穷辨证。我事后体会到,这些研究经常没有什么关怀或者问题。它们要说的是一种状况,一种情景,和这个情景下的个人的体验。它拒绝清晰的定义,拒绝严密的推理,强调一切真义都蕴藏于文本的叙述之间,要靠读者自己去领悟。我去那些研讨会或讲座,只能听懂中三分之一的句子,但是这并没有使我对这个范式做重新的思考,反而让我变得更为焦虑。

博士生到了牛津之后不久就要决定自己的论文选题。我要作非中国研究的心不死。我当时对印度或者澳大利亚所知甚少,甚至毫无兴趣。我本来想做东南亚,但是担心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受中国影响比较深,而且现在有大量华人在,怕别人说我去外国找中国的影子。我也因此觉得东南亚和我自己的背景差别不够大,不能达到我想象的要直面不同、文化震撼、大彻大悟的效果。同时我也想过非洲。非洲是英国社会人类学、甚至是全世界的社会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基地,产生了一系列基本的人类学理论。非洲对我也很神秘,因此很“正宗”。但是考虑我学英文已经困难到这个地步,再学第三个语言并不现实。最后在综合考虑下选择了印度。对语言的考虑也促使我将“技术移民”确定为目标群体,因为我可以完全用英文采访。而我选择悉尼作为移民城市的案例代表,则是因为我听说那儿的生活费用要低于绝大多

数其他印度移民聚居的城市。而且从直觉上判断，我认为研究澳大利亚应该比已经引起广泛兴趣的美国更有趣。

尽管我是基于这些很现实的考虑而选择了这个题目，但是在我申请晋升为博士候选人的时候，我不得不装作自己有着深厚的理论储备。根据牛津的体制，我们第一年的学生叫做“试用研究生”（probationer research students），一般在一年以后要交一篇“厚实论文”（a substantial piece of work），详细论述自己的研究计划，经过答辩，以晋升为正式博士候选人，在此之后方才可以开始实地调查。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疯狂的阅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用眼睛来扫描书籍）和抄录短语，在西方后现代人类学的文字轰炸之下作无力挣扎（不是要抵抗，而是要进入而不能），发挥我所有的想象力编撰了我的“厚实论文”。该报告称，我的研究要描述“流散于国外的空间”（diasporic spaces），具体针对在悉尼的两个印度移民群体：医师和 IT 专业人士，比较他们在家庭和在工作场所中体验到的“流散经历和感受”。说要对这个多维度、多层次、分裂而又整合、随时变动而又历史悠久、既是想象的又是实体的空间举行解构又重构……这完全是我似懂非懂照猫画虎。我相信我的长篇报告在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系——的百年历史上留了一笔。在答辩过程中，一位主考官两次忍不住脱口而出 outrageous（“怒不可遏”或者“气死人了”）。气过之后，两位主考官还是咬咬牙让我过。主考官们的答辩报告指出，我本来没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的，“……但是经过思考之后，我们认为让这个学生重写他的报告也不会有什么益处。我们因此决定让他先去澳大利亚开始调查试试看。”系办公室看了这个报告不免惊慌，和我联系要谈话，幸亏我当时已经到了澳大利亚。我说幸亏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越谈越糟。如果两位主考官真要我重写“厚实”，我确实可能崩溃。

阴云低垂，这是那一年牛津留给我的所有记忆。在那一年，我申请几项补助金来支持实地调查，全军覆没。我不得不用我牛津的奖学金来支持我在澳大利亚的实地调查。同时学习上世纪的拓殖者，积极开发多种生存策略，以最低资金投入获取最大身体能量。我发现煮玉米是相当不错的食物——便宜、便于携带、真饿了的时候也会觉得滋味不错。澳大利亚的清水玉米，应该记得我探索、寻找新世界的艰难第一步。雪上加霜的是，2000年7月的一个下午，存有我所有资料的笔记本电脑在澳大利亚被偷走。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这个贼还算仁慈，要是他光顾我再晚一点，损失将更大，我恐怕无从回忆、重录访谈的诸多细节。

## 豁然开朗

在去澳大利亚之前，我借助互联网联系了当地一些印度社团，在 2000 年 1 月到达悉尼后，我立即开始了实地调查。在头一年里，我调查的是我自己勾画的那个无形的“流散于国外的空间”，我试图了解印度专业人士是通过什么交流手段和跨国网络来改造、维持这一空间的。我强迫被访者回答：“您感觉自己是印度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或两者都是、抑或其他？”大多数的被访者都非常礼貌，努力想一些说辞来给我一个答案。但是有一天一位在悉尼开 IT 培训班的印度人，可能实在受不了了，对我说他那天感冒，不能帮忙，问我能不能问些简单一点的问题。我也感到自己的调查既费劲又无趣。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更不知道怎么去找出路。我一度反而认为，当今的民族志就是要非结构、反系统，所以我的迷惑和被调查者的尴尬可能都是常态，要咬牙坚持，就可能取得真经。

在折腾了一年多之后，2001 年 2 月的一个下午，我疲惫至极，到悉尼港湾边散步。我的脑子早已经是浆糊一桶，无力思考如何造词遣句来描述“流散在国外的空间”是如何多面的、多层的、多彩的……我任由被采访者的故事在脑海中回放，放手让感觉带着我走。我忽然在眼前看到了一束光芒。印度专业人士中那些从业 IT 的职业人士，他们如何通过中介代理来到澳大利亚，如何找工作，丢了工作之后又怎么办的故事，即所谓的“猎身”过程，突然浮现出来。这个流动不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是被在印度的劳务公司（“劳力行”）招聘，在名义上和该劳务公司形成雇佣关系，而后该公司通过和在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通常也为印度人所开，也被成为“劳力行”）的合作，把人派到澳大利亚来；来了以后，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与那个印度人形成名义上的雇佣关系，但是把他（她）发包到其他 IT 公司工作，并从工人的工资里抽头作为利润）真正的 IT 公司给这个印度人提供工作，但是不形成劳务关系。这样，IT 公司可以随时解雇工人，从而使高度灵活和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能。这些故事有棱有角，相当厚重。我立刻赶回住处将所有的调查笔记重读了一遍。到晚饭时我即做出决定：将我的研究焦点转向 IT 职业人员的流动，尤其是他们的劳力输出过程。这几乎完全偏离了我原来的题目。我当时猛然决定要这么跳跃基本上是凭直觉。我不知道新的关注点会有什么理论含义，我只是觉得我不能再自欺欺人踌躇于“流散于国外的空间”；劳力输出的过程显得非常丰厚真实，我感觉我能用手指触摸。我无法抗拒。

一旦我把焦点转到“猎身”上面，我和我的被调查者们——现在被明确界定为 IT 工人——的日子都变得好过多了。对于我的被访者们而言，“猎身”中的种种问题正是年轻的印度 IT 人关心的问题，我甚至都用不着问，他们自己会跑来跟我讲故事！如何找工作、如



何和“劳力行”打交道，正是他们想和我讨论的！我和IT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透明的。我就是为了获得学位而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学生。与工人们讨论时，我也如实地表达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并没有扭曲他们的观点和行为，反而非常有效地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他们。比如我经常告诉他们，他们的劳力行担保人的一些解释和要求不合乎法律，我也鼓励工人们起诉那些违约的劳力行担保人。我的劝告越直率越积极，工人们的反映也就越诚实越直接。他们会详细和我讨论可行性，或者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觉得行不通。这使我细致地了解他们究竟是怎么看待一个特定的局势、是怎么计算的。这也让我意识到，信息和理性分析根本不是他们做决定的关键基础，重要的是他们所直接身处的那个社会场景。比如，工人与劳力行担保人之间的关系在印度被定义为“朋友”关系，劳力行担保人通常在和悉尼的印度人社团的领袖人物有特殊关系，以及工人之间互相猜忌等等，都影响工人的行为倾向。“猎身”的研究重点把我和我的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和所有的人关系都一样近；相反，所谓拉近、所谓进入（群体），意味着我看到了其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而只有当我们看清这些复杂关系，根据其内部关系而建立我和他们的联系，把自己化为其既定结构的一部分，我们才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这个群体。

但是“猎身”决不是一个可以彻底放开讨论、完全透明的话题。因为打政策的擦边球是猎身运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具有敏感性。在这点上，我觉得我可能比来自西方国家的学者更容易赢得调查对象的信任。我来自中国，又和任何“西方”国家没有实际关系，我的调查对象信任我不会对他们的行为轻易形成道德判断，而对他们的动机会更有同情的理解。我的印度IT朋友在谈及对未来的憧憬和生活规划时，往往将我与他们划为同一类人，他们经常不由自主地说“**咱们**印度人和中国人……”我可以毫无顾忌的和五个印度同伴以及无数的蟑螂一起睡在地板上（主要是在悉尼；在海德拉巴的居住环境则要好得多）；我的印度同伴也毫无顾忌让我这么做。我对他们的许多日常感受——比如在为钱担心的同时又想显示慷慨大方——有很自然的同情理解。如前所述，我选择印度移民作为研究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证研究对象与我有足够的差异，以使得我可以符合正统（西方）人类学的要求；然而我却发现，至少对我的实地调查而言，被访者与我之间的共性比我们之间差异性更为重要。显然，我们的共性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我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我以为对调查对象这一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位置的体察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卸下原来要挤进西方主流文献的思想包袱，把研究主题集中在猎身上，我以前收集过的那些数据也获得了新生。甚至我由于预算限制而来澳大利亚的决定，这时候也变成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在1999年后期和2000年，大量印度IT职业人士被猎身到澳大利亚，以至

于当地 IT 业界把这段时间戏称为“印度之夏”（印度之夏是英语中的一个固定词组，指九月初秋的燥热天气）。但是我发现很多印度 IT 工人只是将澳大利亚当作是前往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就业的一个跳板。然而，从 2001 年早期开始的 IT 经济衰退和不久后的高新经济在股市上的崩盘，迫使很多 IT 工人从美国移居到澳大利亚，以寻求更加稳定的工作和澳大利亚的永久居住权。这样，无论是就 IT 工人的移民轨迹来看，还是就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而言，澳大利亚都是“半边缘”的国家；与在世界“中心”（的美国）相比，我在这里能看到更加丰富的流动和社会关系，从而为全球性的观察提供了更好的视角。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我豁然开朗？为什么对“猎身”的关注会有这样的效果？现在回过头来想，这里有两个立场的问题。首先有一个社会立场或者政治立场的问题。我对“散居者空间”感兴趣，完全是因为跟风，跟欧美学院人类学之风，我的调查对象凭什么要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我的苦闷是我的活该。而猎身是一个真实问题。尽管它在学术流行风之外，但是对我的调查对象来说，这个问题需要分析、需要解释、需要应对。其次有一个学术立场的问题。我在国内装模作样学一点人类学，读得懂就读一点，读不懂就放一边，我埋头做浙江村的调查（1992-1998），心里想的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至少是发展问题。人类学是个帮助我把这些问题想透的调查和分析方法。到了牛津，因为要“取经”，读不懂的也要硬读，这才发现“正统”的人类学原来关心人类的“真实”经验和心态，要达成超越文化的理解。我发现很多来自西方的同学对人类学的兴趣，是由于童年的际遇而对其它社会的“生活方式”产生好奇。我觉得我应该要挤进这个正规军。“散居者空间”云云正是针对我对人类学的这一理解而提出要研究印度侨民的生活经验、感觉、想象、认同……但这是一个从本本里抠字眼抠出来的问题。当我把工具当作了供奉的对象，把手段当作目标，把真实的社会问题化解为难以捉摸的“经验”，我原来喜爱的人类学就变成了一个谜团。

我当然不是反对人类学关注日常经验。人类学的基本精神正是要和抽象的概念保持距离，从固定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从研究对象的真实经验出发。但是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去关注、理解“真实经验”。在早期，人类学倾向于把经验等同于整体的生活世界，吃什么穿什么，一天到晚干什么都是传统民族志的重要部分。早期的人类学者这么做，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一些基本情况还不了解，另一方面由于殖民主义学者居高临下、猎奇的眼光，把边缘社会当作一个物种研究。但是在今天，这样的研究取向没有太大价值。它在方法上、在理论创新上、在社会批判上都面临很多问题。全球猎身当然是由一系列的活生生的经验构成的，而且作为一个非正规、随时变动的劳动力管理系统，它必须要通过对日常行为的细致观察才能理解。然而，猎身不是随机的、完全“自然”的经验。它是应对一系列大的制度背景（诸

如劳动力管制、移民控制和全球 IT 产业的变化等) 而出现的; 它靠一系列不同的行动者共同行动而维持; 其内部充满着不确定和矛盾, 行动者必须时刻观察、计算, 以做成及时的反应。这样, 当我明确了我的基本关怀, 明确了制度分析的对象(猎身), 原来分散的、看似无关的现象一下子就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个联系又是很真实的(不是诠释意义上)的联系。总之, 我之所以在此刻豁然开朗是因为我又回到了现实, 抛弃了学科崇拜, 重新让真实问题牵着我走。

到 2001 年 6 月我离开悉尼时, 我搬了 3 次家、一共和 13 个印度 IT 工人合住过。很多泰卢固和泰米尔工人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尤其是乌代(Uday)、阿肖克(Ashok)、拉詹(Rajan)和维努西(Venush) (为了保护所有被采访者的个人隐私, 本书中不使用真实姓名)。我一共访谈了 124 位印度专业人士(绝大部分是男性; 他们或者单身, 或者已婚却独自在悉尼)和 25 个在澳大利亚的机构(包括公司, 专业性组织, 大学和政府部门。访谈是开放式的, 每次访谈耗时一至两个小时, 主要在被访者的住所进行; 许多受访者都被采访过不止一次。

在我把研究重点转移到猎身之后, 我就注意到来自印度南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泰卢固群体。他们在 IT 专业人士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根据安得拉邦财政与计划部 1999 年的资料, 在 1990 年代末, 分布在全世界的印度 IT 职业人士中, 有 23%来自该邦。但是在猎身的日常业务中, 是不是泰卢固人并不显得重要, 是不是印度人则变得很重要的。换句话说, 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区域文化, 而是在国度层次上的认同和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网络。我在海德拉巴(安得拉邦的首府)进行实地调查期间, 与我同住的 IT 人里没有一个是泰卢固人, 甚至无人来自安得拉邦。由于海德拉巴在全球猎身体系中的地位, 海德拉巴现在成为南印度年轻 IT 人聚集的一个中心。所以, 对于这项研究, 泰卢固人的重要性, 并不在于他们任何特殊的“文化”特质, 而是因为他们构成了反映印度 IT 人群的、最具代表性的样本。由于这个原因, 本书并没有着力划分出泰卢固人与其它印度 IT 人之间的界限, 没有把泰卢固人的文化特殊性当作一个单独题目来考查。我关注的是制度安排, 泰卢固社会的种种特殊风俗和观念被看作是呈现制度安排的具体场景。我在书中也解释了为什么特别多的泰卢固人成为 IT 技术人员, 这主要是一系列历史和社会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 而不是出于什么区域文化。我们需要分析的正是, 这些偶然性中如何蕴含了制度和结构的作用。

## 印度海阔天空

我 2001 年 6 月我离开悉尼, 前往海德拉巴。途中我特意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停留, 访

谈了在那里的几个泰卢固 IT 专业人士。既不同于悉尼，也不同于海德拉巴，吉隆坡代表了全球猎身体系中在另一个层次上的节点(见第七章)。因此，逗留的时间虽短，吉隆坡的调查大大丰富了我的民族志。在海德拉巴，我和通过乌代介绍的一群单身 IT 技术人员住在一起。通过这些朋友的介绍，又根据在网上发现的信息，我在海德拉巴详细访谈了 43 个 IT 人士。和在澳大利亚一样，我的访谈对象中男性占大多数。他们有的雄心勃勃要出国发展、有的在当地事业蒸蒸日上、也有的长期失业、专业逛街。我也走访了不少他们所就职的 IT 咨询公司(劳力行)，政府官员和学者。我又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在安得拉邦沿岸的西戈达瓦里(West Godavari)地区的两个镇、三个乡村之间穿梭调查。这一地区是大量的 IT 专业人士的家乡。我去那里当然不是要找他们——他们很少留在小城镇或者农村——而是要考查这个群体的历史社会背景。



“如果你不加入 NIIT(印度全国信息技术培训)，你的人生将失去了什么！”

印度村庄墙上的 IT 培训广告。作者摄影

2001 年 9 月 11 日，急性肝炎击倒了我。在海德拉巴的公立医院非常拥挤，我根本无法住院；而大多数私人医院是由印度归侨或者由滞留海外的印度侨民投资开办，专门服务于诸如 IT 专业人士之类的高收入的群体，自称提供国际标准的医疗服务，当然也按国际标准要



价，我付不起。看到自己成为这个私有化浪潮中不平等全球化发展格局下的受害者，有病不得治，我不禁泪湿衣裳。我在新德里的朋友塔希尼姆·帕塔普里(Tasnim Partapuri)伸出了援助之手。她的姐姐、姐夫侯赛因夫妇都是医生，在德里著名的圣·史第风森(Sant Stephens)医院工作，她和他们住在医院后院的职工宿舍里，她让我立刻去德里住到他们家，这样我也算是“住院”，可以通过她姐姐、姐夫得到治疗，又不用交住院费。想到在中国人们对有传染病者躲之不及的情形，我真是感动不已。当全世界都在围绕着纽约的轰炸而忙乱时，我以(美元)极低的汇率把身边仅存的美元换成卢比，搭机去往德里。蒙承希尼姆和她一家人的照顾，我的病痛反而变成了一次愉快的休整。在他们家我也终于有闲暇通过印度媒体的报道收集到了相当多的二手信息。

尽管有疾病的困扰，我在印度的这段时间却是整个研究过程中最兴奋、效率最高的部分。我简直觉得有神力相助，我所感兴趣的、关心的事情几乎在海德拉巴等着我去发现。那些全日制等待出国的IT专业人士都非常乐于陪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中国青年在城里逛逛，喝上一杯果汁或可乐(印度的茶和咖啡被认为不够国际化，通常只有我才喝)，再带我去走访各个劳力行以打听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劳务市场状况。在悉尼，猎身过程中有很多敏感问题，劳力行的老板和工人们始终压力重重，人们在彼此之间互相提防紧张，我必须小心翼翼地界定自己的位置，以和不同的人合适互动；而海德拉巴则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流动空间，各种希望与失望交替呈现，年轻的IT人视之为正常，彼此开着互相的玩笑、也毫无保留地自嘲。更为重要的是，当我完全浸泡在基层的生活中，我随处遇见原先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又完全合情合理的现象。比如大量失业的IT工人、嫁妆的增涨、农民对子女接受IT教育的成本-收益计算等等，它们无疑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又和我们对全球化的一般想象大相径庭。它们向我展示了真实生活中的矛盾和讽刺，也让我进一步看到全球化并不仅仅是加强了全球范围内的联系，更多的是重新安排、甚至是重新强化人类社会的的不平等关系。我在澳大利亚观察的猎身是我们通常忽略的全球化下的一股暗流，而印度之行则让我看到这股暗流的源头，让我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这暗流会对我们平常所见的显流如此重要。

### 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

原来以为要到牛津大学取经，最后才发现真和孙猴子一样，是去印度取了真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去印度的路上，通过种种艰难，看到了什么是真经。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自信，回到自我，回到真实问题。在回到自我之后，我也体会到一个在更具体的层面上的人类



学研究套路，这个套路要通过民族志对某一普遍社会现象形成新的认识。我称之为“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的基础是民族志，即基于长期实地调查而写成的系统的、细致的描述；但是在同时，它力求分析性、解释性和批判性，所以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进行概念上的抽象。

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涉及到认识论中“具体”和“总体”的紧张关系。我在做浙江村课题的时候，就体会到了这个从实践来的问题。“在对我们自己生活的理解中，我们往往不能把自己的亲眼所见（社会的具体生活）和亲身所感（社会在总体上的面目）结合起来。”我们的思维、判断往往是关于总体的，而行动则必然是具体的。在浙江村这个例子里：

对“浙江村”比较熟悉的居民和官员对此一个通常的评论是：“其实这里百分之九十五、九十八的人都是正经做生意的，可就是有那么几个在这里捣乱的。”在这里，“百分之九十五比百分之五”是通过人们的具体观察得出结论。上面这位干部又指出，这百分之五所以会存在，并引起焦虑，是因为它和那百分之九十五形成了一个百分之百，是一个整体。这个观点显然已很有社会学的味道。但这又给他带来了新的困惑：从他的具体的认识上看，轰赶不是办法；但从整体的角度看，又好象只能轰赶。……当政府机构对“浙江村”形成正式决策的时候，是把“浙江村”看作一个整体现象的。但是当他们去执行决策的时候，面对的是具体的人人事事。要在具体的人人事事中落实在总体上形成的结论，最后的办法只能是“一刀切”。（项飏 2000：13）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体和总体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对总体的想象，至少在空间范围上，空前地扩大了；而我们的直接观察和行动，依然只能是一时一地很具体的。如果我们既要充分关注原生的细节的复杂性，又要形成超越直接经验的认识，我们必须要靠概念化进行想象和选择。在我的研究中，安得拉邦的农村、海德拉巴市、吉隆坡和悉尼之间的联系并不都是可以立即观察到的，而直接观察到的联系都是片断式的：一个在海德拉巴人正在吉隆坡找工作，另一个则因为身在悉尼的亲戚拒绝为他提供移民担保而备受困扰，还有一个刚从悉尼回到海德拉巴，要招收去吉隆坡的工人……为了厘清这些流动和联系，一个抽象化的过程十分必要。抽象化将各种联系和流动组织在一个概念体系当中，给那些相互关联的地点赋予结构上的位置和制度上的意义。我关心的不仅是显现的、行动者自己意识到的种种跨国联系，而更重要的是去发掘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毫不相干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出我们以前尚未意识到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是帮助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的有力工具。本书的一个主要特定是将民

族志的细节融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中。政治经济学帮助我们从小生产、消费和分配的关系里看出人和人的关系。它因此为思考提供了极大的延展性。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生产方式来考查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性别关系等等。同时，它不是就社会关系而谈社会关系，这又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比如，考查性别关系和女性角色期望，必须要基于对工作关系、家务劳动分工、收入差别、婚姻制度的考查，而这一切又将和整体的社会生活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我要坚决反对现在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所谓文化分析反映和阐释当事人自己怎么看问题，而政治经济学是由外界强加的，忽略甚至扭曲人们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情况可能正相反。老百姓在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时候，通常是彻底的政治经济学家，倒是外来学者要对社会现象作文化解释。印度的嫁妆制度通常被外人认为是一项典型的“文化”实践，包含着各种特别的文化习俗和人文理解。但是在我的调查中，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无一例外地向我一针见血地指出，金钱和社会地位是他们在考虑嫁妆时的首要因素。印度的中产阶级家庭，特别是那些侨居海外的，永远在宣称家庭至上、对子女和对父母无条件的爱是“印度文化”；那么为什么父母一定要煞费苦心强迫他们的孩子放弃在其他方面的兴趣和天分，而逼着他们去学习 IT？更为重要的是，所谓“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等等，不可能是老百姓自己的说法，它们是掌握知识和话语权力者的述说。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是真实日常社会中的逻辑。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即其对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不平等的关怀，促成了它对概念化和抽象能力的追求。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倾向于把现实情况“当然化”从而接受；如果我们不满于现状，我们必然要通过概念化的分析，指出背后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那些平铺的民族志是政治上的妥协。）比如“劳动”的概念、“价值”的概念，都是非常具体的存在，但是具有极高抽象能力和理论化潜力。

但是民族志式的抽象化和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又不一样。政治经济学从一些基本原理或者假设出发，根据逻辑演绎，意欲达成关于普遍“规律”的描述。而民族志式的抽象化是从具体现象出发，通过在具体场景下的不同现象之间的实质性的联系的梳理，呈现某现象的整体形态(configuration)。政治经济学通常追求建立一些必然规律，而民族志式的抽象化则充分重视事物发展的偶然性和历史性。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式的抽象其实和许多人类学的抽象化也不同。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是人类学界影响巨大的抽象化和理论化成果，但是它们更多的是以民族志为材料基础，而作出普遍的、规律式甚至程序化的陈述，而不是民族志式的。其抽象是外在的。比如结构功能主义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不管是饮食男女、宗教仪式、还是政治军事关系，不管它们各自的特殊性和历史性，统统都可以用结构功能说

过去。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功能主义相反，不是从外往内套筐筐，而是要由里而外寻找决定文化现象的“密码”。他们把社会制度和现象当作语言对待，因而这也不是民族志式的抽象。我以为经典的民族志式的抽象应该推埃文斯·普里查德的“裂变结构”和利奇的“钟摆模式”。“差序格局”也是一例。此外，在196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为我们如何具体实施民族志式的抽象化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威利斯(Willis)的文化研究名著《学会劳动》对我影响非常大。书的第一句话就提出他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工人的孩子又自愿地当工人？全书根据细致的、投入式的观察，系统分析了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的文化机理。

民族志式的抽象化当然有种种局限。正如最近的一些书评指出，我的书可能过于清晰。我也意识到我可能过于强调我自己的概念逻辑，过于关注清晰，而没有充分地体现生活本身的混乱与无序。我在接受2008年度里兹奖(美国人类学学会最佳城市人类学专著奖)的时候，对此作了说明：

有人告诉我，民族志一定要往复杂里写，是因为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复杂的，是充满能动性的。好，假设我是一名“土著”的被调查者。我花了我的时间向你解释种种问题，我想的是知道你怎么想。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你的观察是片面的、不确定的，我知道。我也不觉得你们费尽心思让我的文化“站起来说话”有特别的价值。对我来说，我的能动性就在于：我要反思你所作的观察，我要超越日常话语而形成自己的理论，然后要和你对话！当我注意到你其实在为自己写作，而不是在邀请我的评论，我感到我的主体性被否定了。拜托，请不要担心过于清晰、连贯、甚至民族中心主义。请直截了当告诉我你怎么想，**我将告诉你我怎么想**。  
(Xiang Biao 2009: 26)

## 察彼以察己

我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探索最终却促成了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在我的印度朋友面前，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而对于那些我曾经渴望去追随的人类学概念，我却觉得陌生。当我在2001年10月结束我的实地调查，回到牛津时，天空更湛蓝，树木更翠绿。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研究印度，我是否收得出什么独特的见解？完全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我以为我没有必然的优势。比如，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固然会思考很多局内人习以为常的现象，但是我很快发现我也会过度敏感，容易对现象作过度解释。很多次，我为一些意外的“发现”而欣喜若狂，但在花了更多的时间观察之后才明白这些现

象纯粹是巧合。我不能很快对所研究的社会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费孝通和斯里尼瓦斯(Srinivas)的著作都因其可读性很高而备受推崇,我认为这来自于他们对社会总体趋势的把握,以及对这种把握的自信。这种把握和自信使得他们能够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删繁就简,直中要害。我这本书带给读者更多的是详细的、经验性的材料,这可能会使我的分析更具有实证性,但也缺少深刻的洞察力。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印度学者花了相同的时间和经历,很可能会比我做得好。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关于我自己:这次研究教会我更深刻的反思,以及变得对我自己的社会(中国)更加敏感。就在写本书英文版的同时,我还在为浙江村著作的英文版而忙碌。当我在2004年重读自己在1998年的书稿,我对自己忽略了那么多的不平等现象而感到震惊(沈原教授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我在做浙江村的研究和在写猎身时,我都没有刻意地要和什么理论对话。我对浙江村内部不平等的忽视、和对猎身中不平等的重视,我感觉都是很“自然”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改变了我的看法?我想首先是不同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不同的研究动机。我在浙江村英文版的序言中写道:

研究“浙江村”的时候(1992-1998),精英主义是中国社会里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把西方的自由市场模式视为中国发展的最终答案,而把和西方发达市场看似格格不入的一般人群视为发展的负担。为了对这种意识提出异议,我着力展示在“浙江村”——这样一个由“低素质人口”组成的商业移民群体——其内部强大的发展动力。……换句话说,我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可能使我更关注到浙江村如何在开展商业活动和对抗国家方面的强大动力的成功经验,但是忽略了其成功经验背后的原因:浙江村正是靠数量众多的妇女和工人们在狭小的车间里的辛勤劳动,才能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此不同,在千禧之际,(全球的)主流论调是,知识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劳资关系无关紧要,灵活的、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对生产力的提高必不可少。在这一背景下,我感到有必要去检验这种灵活性的社会代价。因此,我格外关注IT业劳动力本身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劳动者为什么可以如此“灵活”地被雇佣和被解雇,是谁承担了代价、谁又享受了利益。(Xiang Biao 2005, xvi-xvii)

除了研究的历史时段和社会背景不一样,我必须承认,我的身份认同(是中国人而不是印度人)也很可能影响到我的视角。这个身份认同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如果猎身体系是一个中国案例的话,我的研究也许会有所不同——比如,我也许会将焦点更多的集中在劳力行的经营策略上,以及劳力输出在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带来的效益等。我

感觉到在中国案例中,我看到更多的是潜在的发展能力,而在印度案例中则更多的看到控制、剥削和不平等。我对于中国的观察更倾向于进行操作层面上的批判,思考事情可以怎样提高改善(因此是“建设性的”);而关于印度的视角则更多的是规范层面上的批判(指出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甚至是愤世嫉俗的(强调事情不应该或者不可以是什么样的)。我怀疑在某种程度上,我到印度去探索,其实是寻找我在研究中国时所失去的东西。我自觉不自觉用不同的眼光看中国和印度,我并不因此感到骄傲,也并不因此而羞耻,我对自己能够通过这次劳力输出的研究认识到这一点感到欣慰。

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和印度?这不能只靠学者个人的反复自省。关键要塑造新一代的学人,塑造新的学术生产体系。因此,如果我这项研究能够抛砖引玉,以引导人类学方面更多的“南-南对话”,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也邀请我的印度同行们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家们来对中国进行更多的调查,不仅对处于世界主导地位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并对根深蒂固藏在我们心中、而却没有被我们察觉的成见提出疑问。

## 参考文献

- 沈原, 2006,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社会学研究》, 第2期。
- 王铭铭, 2000, “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以人类学为中心的思考。” 《“费孝通教授九十周岁诞辰欢聚会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 Xiang Biao 2005. *Transcending Boundaries: Zhejiangcun: the Story of A Migrant Village in Beijing*. Translated by Jim Weld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5.
- Xiang Biao 2009. “Tackling Global Uncertainties.” *City & Society*. Vol. 21, Issue 1, pp. 22 - 27.



## 专题征文启事

最近一段时间《立场》在接收稿件的同时，陆陆续续地收到了一些热心读者的意见反馈。这些反馈对我们的工作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肯定和鼓励，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除此而外，在读者的来稿与来函中间，我们发现当下还有许许多多的教育问题以及与教育相关的问题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引发更深的思考。

我们把这些问题整理分类，并且以征文的形式提出来。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立场》这个传播媒介，把这些有价值的问题提升到公共讨论的层面，以引起更为广泛的重视，激发更为细致深入的对话与探讨。因此，从本期开始，《立场》特别针对以下四个不同的专题不定期征稿，我们热忱地期待着各位读者踊跃地加入到这些讨论中来。此外，我刊也继续欢迎大家来稿探讨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的其他话题。

### （一）关于城乡教学成效的描述与分析

城乡教育不平衡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引起了舆论和学界关于城乡教育财政、教师合格率、教材适应性和学校设施等多方面的讨论与研究。自2006年“两免一补”的政策在全国农村学校实施以来，农村孩子上学贵的问题已经大大缓解，教学质量和学习成效自然成为农村教育改革的焦点。然而，“能否学得好”是比“能否上学”复杂得多的问题，涉及到教育系统的每一个环节——教师培训、学校管理、课程安排、教学方法、家庭环境等。可是，我们目前并没有成熟、有效、系统的改革方案。无论是新教学方法还是新教材与课程的引入都应视为探索性措施，需要对教学质量进行细致深入的政策评估才能确定切实有效的方案。而要进行评估，必须跟踪政策实施前后儿童的学习成效，对其进行比较。

目前，我们更多的是笼统地讨论城乡教育质量差距，急于探求造成差距的原因，而对于城乡学生在学习成效上的具体差距所知甚少。例如，很多在农村的教师都体验过农村学生基础差的情况，但是乡村、县镇、和城市儿童进入小学一年级时在语文和数学基础知识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一年、两年、六年的学校学习之后，这些差距是加大了还是缩小了？加大了多少，缩小了多少？这些差距中间有多少可以归结为家庭教育跟不上，有多少是因为学校在资源、师资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其他各年级、各学科亦可提出相应的问题。类似这样的描述，是对城乡教学状况最基础的把握，应该是农村教育改革思考的起点，也是评价教育政策是否有效的必须信息。遗憾的是，这似乎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更没有进入公共讨论的视野之中。

《立场》杂志就此专题向广大家长、教师和教育研究者征稿，希望类似的教育教学细节问题能够引起学界和社会更广泛的重视。

## （二）反思“减负”及其后果

长时期以来，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一直被作为“应试教育”体制中的痼疾，受到公众舆论和教育专家的谴责。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中央以及地方的教育部门频频推出改革措施，以杜绝和限制此类问题的滋生和蔓延。例如，近年一些地方为了给学生“减负”，相继取消了中小学的期中、期末和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强制限定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以及禁止学校利用假期给学生补课等。

依靠行政力量制造出的“减负”声势，能够及时回应舆论要求，化解舆论压力。但是此类举措，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我们对一些现实和细节性问题思考的愿望和能力。因为任何对教育的良好愿望（包括基于行政命令之上的诉求）都不能取代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所做的细致观察、历史性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评判。“减负”同样如此。面对当下围绕“减负”的各类诉求，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追问的是：类似于取消学校对学生学业的考察、缩减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的这些“减负”举措，在不同的教育现场是如何被理解和操作的，产生了一些什么后果？比如，它对学校整体的教学计划、每位教师的教学活动具体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影响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波及到每一位家长和学生中间？另外，与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和学校相比，那些教育质量较差的地区和学校，是如何平衡教学水平与“减负”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减负”对他们而言，包含了怎样的意思和内容？同样，从学生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拥有文化资本程度的差异来考虑，“减负”是否构成了多重意义，导致不同的家庭对这些教育举措作出不同的评判和选择？……类似这些细部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然而，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教育学界、社会和政策人士对此却知之甚少！

《立场》杂志从本期起长期向读者征募此类稿件。投稿者可以通过自身在现实工作、子女教育以及学校学习中遭遇到的各种“减负”问题，阐述思考和认识。在此我们特别期待那些常年在中小学从事教育工作的校长、教师以及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作为“事件当事人”给我们投稿。这里特别需要提醒投稿者注意的是，希望每一位来稿者在针对当下教育问题阐发观点时，尽可能回避一些主观情绪的宣泄和简单的道德评判，尽量结合工作和生活的实际体会思考“减负”给现实带来的正面或是负面的影响。只有暂时把“先见”“定论”搁置一边，努力回到描述和分析“现象”本身，我们才有可能内在地把握现实，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 （三）网吧、学生与学校

互联网兴起后，网吧在中国应运而生。虽然国家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规定中小校园周围 200 米内不得设立网吧，今天，中小城市和县乡一级学校周围有一两家网吧恐怕是难免的。学生因为上网缺钱或欠债而偷拿蛮抢也不鲜见。那么，学生去网吧，到底都做些什么呢？是不是都沉迷于网络游戏呢，还是也为了寻求知识？他们喜欢去网吧是因为网络社区的吸引力吗？网吧是否也是学生逃离枯燥学校生活的精神避难所呢？或许他们也能通过上网而获得仅靠周围环境难以支撑的精神成长？乡村网吧的兴旺与留守儿童的生活之间又有何种联系呢？学校对网络和网吧的态度、教师的言传与身教又如何呢？

我们欢迎针对网吧和当今学校教育与学生生活的相关问题的稿件，尤其欢迎有理有据、有分析有思考的经验研究与个案分析。

#### （四）NGO 在中国

近年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发展迅猛。在各个领域中都能看到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们活跃的身影。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中，NGO 办的各种活动层出不穷：办图书馆、义务支教、培训教师、开办城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等。这些组织的出现弥补了政府无法及时准确地提供公共物品的缺陷，也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提供了一个阶层互动的空间。

另一方面，正如《立场》本期杂志中关于梦想图书馆的调研报告所提到的那样，NGO 的工作开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最初的热情消退之后，公益组织要面对的是严峻的生存状态，同时更加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这些活动究竟如何才能持续下去？《立场》杂志希望借助我们的平台，展开对于教育公益组织的思考和讨论。

例如，NGO 的组织结构如何？内部管理采取什么样的模式？你所认识到的教育 NGO 都是怎么运行的？NGO 组织是如何自我学习以促进其理念、组织结构和项目的演进变化的？项目从最初的设想到具体实践以及事后的评估，这些流程是怎样的？和国外许多有经验的 NGO 不同，我们的 NGO 组织大都比较年轻，在项目设计的过程中会有何创新？同时，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并实现其本地化以提高项目和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志愿者和组织者面临哪些困境？又是如何理解、分析、应对这些困境的？等等。

这些问题只是抛砖引玉。我们既期待大家来稿交流鲜活的个人体验，也欢迎严肃的理论思考。我们希望能够深入了解不同 NGO 发展、成长的故事；也希望通过 NGO 更进一步理解中国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来稿请寄到[info@lichang.org](mailto:info@lichang.org)。我们期待着热烈、深入、细致的讨论！

《立场》编辑小组  
2009 年 7 月

# 立场 - 教育对话

POSITIONS: Dialogues on Education

---

- i Preface
- 1 Curriculum Reform in A Rural Village: the Experiment of Rural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Sara LAM*
- 15 A Journal of A Volunteer Teacher in Western China (III)  
*ZHOU Yisu*
- 35 World, Theories, and Self: An Overseas Adventure of A Chinese  
Anthropologist  
*XIANG Biao*
- 50 Call for Papers on Special Topics

**Copyright:**

*Positions: Dialogues on Education*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 Derivative Works 3.0 Unported License.



---

**Editorial Team**

LAI Lili, LIU Yu, LUO Jun, WANG Dan,  
XU Jianping, ZHOU Yisu

**Website**

[www.lichang.org](http://www.lichang.org)

**Contact Us**

[info@lichang.org](mailto:info@lichang.org)